



2013年9月26日，马道门的修鞋匠和他的两位顾客。昙华林老街历史悠久，近代以来由于学校、教会、医院等场所集中，中西方文化在此碰撞交融，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建筑文化。无论是从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名人故居标注，还是从老墙上挂满的历史建筑保护标识牌，都可以看出旧时的昙华林不是一般的住区。不知什么时候，大洋房旁边生长出了那些关系紧密的小房子。日升月落，大房与小舍经历了生长、融合。图片“窗”为主题的照片即反映了今天瑞典教区洋房欧式廊道的不凡改造经历，窗体上那些涂涂改改的施工痕迹与细节，再次提醒我们真实历史信息的价值所在，它们佐证了居住主人的更替、生活经历的沧桑，彰显着一种不一样的“陈旧”美感。昙华林的街道历经了兴衰荣华的更替，折射着不同时代的特色。无论何时，当我们还能看到它，我们必然不会忘记那一段段值得怀念的故事，我们也更加尊敬那些老房子和房子里可爱的人们。

（摄影 / 撰文 何海威）

编委会名誉主任：彭富春 罗联峰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田子渝 刘玉堂 刘庆平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张笃勤 陆永初
陈芳国 姚伟钧 涂文学 彭小华

编委会主任：张明权

副主任：朱向梅 刘洪波 熊少明
董 菲 杨 华 阮祥红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焕桥 王四清 朱永利 任丽英
刘海燕 李文洲 张智勇 陈胜利
陈红英 林 伟 徐 莉 潘红莲
燕来宾

主 编：阮祥红

副 主 编：朱伟峰 丁星火

执 行 主 编：丁星火

特 约 编 审：简 桦

本期责任编辑：刘 玮

编 辑：许 濛 章旷怡

封 面 设 计：王 鹏

时代年轮

<<< <

4 1984，周继红夺得中国首枚跳水奥运金牌 / 陈晓桥

风雨同舟

<<< <

12 一名城建人的成长路 / 王 飞

九城同心

<<< <

16 红色“徐家军”（上）/ 刘祖书 徐光思

委员天地

<<< <

21 崇真尚美，用纯粹的心剪裁服饰的美

/ 孙菊香（口述） 章旷怡（整理）

25 珍惜人生际遇 不负使命担当 / 鲍惜光

商聚汉皋

<<< <

28 芯片征途上的冒险之旅

/ 范陈杰（口述） 许 濛（整理）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都市史话



33 救亡漫画宣传队与黄鹤楼大壁画 / 姚馨语

38 大使夫人组办中国民乐演奏会
——武汉杂技团三次炫技法兰西之三 / 何忠杰

史海钩沉



41 1900 年汉口德租界堤防码头工程揭秘

/ 范 榕 胡全志

46 一个法国人的武汉洋务运动观察 / 吴 敏

人物春秋



50 汉阳藏书家叶名澧略述 / 王晓清

扫街探疑



56 汉口西门子洋行、美最时洋行旧址探讨 / 韩少斌

高校访馆



61 藏身高校的“小省博”

——湖北大学博物馆 / 李本义 贺兴义 蔡 莹 李牧宸

主 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 办：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 刷：武汉市仁大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每月 28 日

定 价：8 元

地 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246 号

邮 编：430010

电 话：（027）82220669（传真）

E-mail：whzxwszl@163.com

1984，周继红夺得中国首枚跳水奥运金牌

◇ 陈晓桥

轮印：1984年8月10日，在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跳水决赛中，19岁的武汉姑娘周继红技压群芳，在10米跳台夺得中国首枚跳水奥运金牌。周继红现任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主任，40年后的今天，她率队征战第33届巴黎奥运会，硕果累累。8月6日，小将全红婵继东京奥运会之后，再度在10米跳台成功卫冕。

完美一跳

1984年奥运会进入最后阶段，中国体育健儿在各个项目战果辉煌，为祖国夺得了一枚又一枚金牌，这使中国跳水队员坐不住了。跳水项目8月5日从女子跳板跳水比赛打响，四天来东道主美国队在男、女两项比赛中已获一枚金牌、一枚银牌、两枚铜牌，而中国选手仅得一枚银牌、两个第四名、一个第五名。

转眼，被认为是中国队强项的女子跳台跳水比赛开始了，前景如何呢？这是一个悬念。按规定，中国只能派出两名选手：广东选手陈肖霞和湖北选手周继红。她俩的主要对手：美国19岁的温迪·怀兰，世界锦标赛冠军；22岁的米歇尔·米切尔，1983年美国全国冠军。

当年4月，米切尔的肩部动了手术，人们对她参加奥运大赛的前景产生了怀疑。可是，在7月初的全美奥林匹克跳水选拔赛上，她出人意料的以477.09分的成绩名列榜首。美国跳水界对她的期待很高，认为她是美国队的“希望”。

8月9日的预赛结果，令中国队精神为之大振，巨型电子记分牌上亮出的名次是：第一名周继红，462.87分；第二名陈肖霞，434.88分；米切尔名列第三，402.39分；怀兰排名第五，376.11分。这个结果，在观众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可是，有些



周继红完美一跳

美国观众不以为然，这毕竟还只是预赛嘛。一名美国籍的奥运会组委会工作人员对记者说：“明天决赛，我们要倒过来！”意思是美国选手明天要夺冠、亚军。

8月10日下午4时30分，女子跳台决赛开始了。获得预赛前12名的选手参赛。盛夏的阳光下，洛杉矶南加利福尼亚大学露天游泳池碧波粼粼，10米跳台成为人们目光的焦点。看台上座无虚席，早已成为一片星条旗的海洋。

比赛一开始，四名夺魁呼声最高的选手之间便展开了激烈争夺，风云变幻，前景莫测。跳完第一个规定动作，预赛中排名第三、第五的米切尔和怀兰，一下子超过周继红和陈肖霞排到第一、第二。观众席上“USA！”“USA！”的喊声大作。

四个规定动作比赛结束，周继红、陈肖霞又翻了上来，名列第一、第二，米切尔第三，怀兰第四。周继红在跳第一个自选动作时稍有失误，只得到48.72分落到第二，陈肖霞取而代之名列榜首。

接着两个自选动作，周继红发挥正常，达到378.81分，又一次居于领先地位。陈肖霞却因动作失常，从第一落到第三，随后

又降为第四。而米切尔却以367.35分跃升至第二，怀兰以365.52分进入了前三名。

形势再清楚不过了：中国队寄望夺得第一枚奥运跳水金牌的陈肖霞，已经没有可能完成这一伟业。分别名列第一、第二的周继红和米切尔，积分只差11.4分，而怀兰又以仅差1.83分紧逼在米切尔之后。三个人相互“咬”得很紧。

每个人只剩下最后一个自选动作了，鹿死谁手，在此一“跳”。

周继红的这一跳可是不易：她的最后一个动作是“向前翻腾三周半屈体”，难度系数3.0，是这次比赛中难度最高的动作。当年7月，在加拿大埃德蒙顿举行的第12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跳台跳水决赛中，周继红和同伴吕伟的比分一直领先，而她的最后一个动作正是“向前翻腾三周半屈体”。因为金牌眼看到手，周继红一时心情紧张，起跳动作失常，影响了空中动作的完成，跳“砸了锅”。她只得了24.3分，最后落了个第四。赛后，她懊悔得流下了眼泪。

此时此地此人，又是这个“向前翻腾三周半屈体”，难道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的那一幕要重演吗？好一个周继红，她居然像往常一样，走进供运动员休息的帐篷，披上浴巾，戴上耳机，甜滋滋欣赏起她最爱听的钢琴协奏曲来了，好像这不是在奥运会赛场，而是在休闲娱乐。

关键的最后一跳开始了。这时，恰好有几架喷气式飞机从高空编队飞过，在蔚蓝的晴空用喷气组成了“GO, U. S. A.！”的字样。美国观众顿时轰动起来，拼命挥动手中的星条旗大喊大叫，有的干脆把遮阳帽扔到了空中……

怀兰跳完后，最后积分一跃而为422.07分。米切尔跳了一个漂亮的向内翻腾两周半



周继红登上领奖台

屈体，得到 63.84 分，总分达到了 431.19 分。下一个是陈肖霞，她跳的是“向后翻腾两周半屈体”，得 60.03 分，总分 419.76 分。就剩下周继红还没跳了。

至此，米切尔积分最高，周继红只有 378.81 分。这就是说，周继红的最后一跳，必须至少得 52.39 分才能拿下第一名。教练徐益明按捺住心中的激动，尽量用平静的口气对周继红说：“好好放开跳，走台放松，入水腰挺直。”

周继红穿一身深蓝色镶白边的泳衣，缓步登上了跳台第三层台阶。她停了一会儿，用毛巾擦了擦脸，整理了一下泳衣，然后登上了那高高的 10 米台。

广播喇叭响起了播音员清晰的声音：“周继红，中国，向前翻腾三周半屈体，难度系数 3.0。”

周继红习惯地用手抹了抹脸和头发，调整了一下呼吸，站稳了。然后，她起步助跑，在步伐连贯轻松的助跑之后，从跳台的前端飞身跃起，两臂向左右平伸，在做出屈体三周半翻腾之后身体打开，挺得笔直插入水中……整个动作连贯、流畅、优美，一气

呵成，观众席上响起兴高采烈的欢呼声和热烈的掌声。但随即大家都安静了下来，目光一齐转向记分牌。指示灯亮了，7 位裁判的判分中一个 7.5 分、三个 6.5 分、三个 6.0 分，共 56.70 分！

冠军拿到手了！

果然，记分牌上亮出了最后名次：第一名，周继红，中国，435.51 分；第二名，米切尔，美国，431.19 分；第三名，怀兰，美国，422.07 分；第四名，陈肖霞，中国，419.76 分……

这场比赛，历经紧张的开局、激烈的相持、完美的突破，“凌波仙子”周继红攀上了人生巅峰。

这也许是个巧合：中国上一次参加奥运会是在 32 年前的 1952 年，而那一年中国举行了第一次全国跳水比赛。32 年后，中国的跳水运动员夺得了第一枚奥林匹克金牌。这 32 年的日日夜夜，我国几代跳水运动员、教练员为之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心血啊！

18 时 28 分，乐队奏响了中国国歌，全场观众起立，向缓缓升起的五星红旗致敬。这可是在“跳水王国”升起的中国国旗。

领奖台最高处，周继红肃立着，胸前挂着金牌，手里捧着鲜花。她仰着头，眼前那面熟悉的国旗显得那样鲜艳夺目，在太平洋吹来的海风中高高飘扬……

小鹰试翼

周继红 1965 年出生于武汉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在兄妹五人中排行老四。她生得瘦小文静，聪明伶俐，爱蹦爱跳，一点也不娇气，深得家人喜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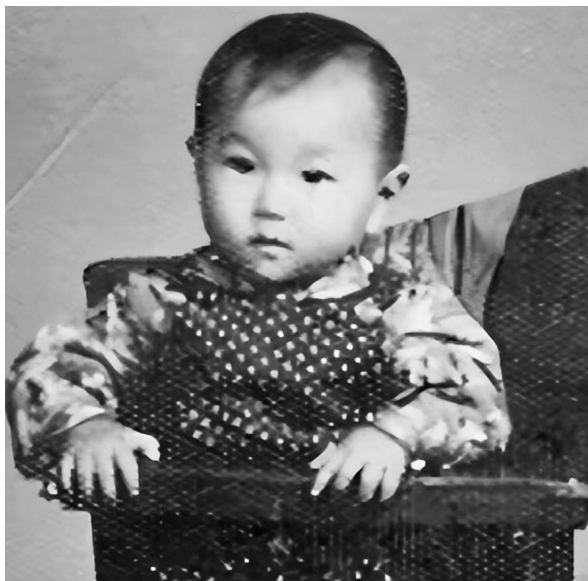
小继红的父亲对武汉的杂技表演很感

兴趣，经常带她去看演出。她深受那些精彩动作的影响，很小便迷上了翻、滚、劈叉……学得有模有样。她常常悄悄溜到江边，独自练个没完没了。

小继红 1972 年上小学，一年级就走上了体育之路。一次，她在学校尽情发挥自编自演的杂技动作时，被合作路业余体校教练邹义鹏一眼看中，认为她有体操训练的潜能。

那时候接受体操训练，场地器械真是简陋极了。筹建中的体操班一无所有，一根锄头柄，一头搁在窗台上，一头压在教练肩上，便成为孩子们摆、翻、拉的“单杠”。教练那鲜血渗出衬衣的肩头，将一粒为祖国的体育事业献身的种子，深深埋入了小继红的心田。

小继红在教练的影响下，一面努力学习各门功课，一面参加体操训练。她在班上是三好学生，课余时间全部泡在体操训练中。四年艰苦训练，她的体操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如果继续深造，也许会成为一名体操名将。



周继红童年照

一个偶然机会，小继红的体育之路发生改变。

一次，小继红看别人跳水，觉得很好玩就跟着学。她才学了三天游泳，对跳水更是陌生。她的第一次跳水，是被人用绳子系住，硬着头皮往水里跳的。就这样迷上了跳水，看来跳水确实与她投缘。

1976 年，在业余体校老师的引荐下，小继红 11 岁进了湖北业余跳水班，不久被选入湖北跳水队。她天赋并不理想，身高只有 1.55 米，体形也不出众。从裁判的角度，乍看上去并不能打出好的“印象分”，因此在跳水运动的道路上，她经历了许多困苦磨练。

小继红希望用高超的技艺弥补自身的不足，创造优异的成绩。她刚由体操转学跳水时，脚背不能绷直，教练让她在课余时间跪着压腿，一跪就是数小时，跪得脚软筋酸不能走路。她却从不中断，硬是苦练了一年。她在弹网上练翻腾技巧，一堂课常在 500 次左右，翻得头昏眼花、精疲力尽也不停歇。聪明、勤奋，加上胆大，经历多年的艰苦磨砺，跳水技艺有了飞速提高。

自 1978 年入选湖北跳水队，小继红一路并不顺利，时过三年，她在全国少年跳水赛上屡屡名落孙山。因此，她对自己的才能、前途不由产生了动摇。

1980 年冬季集训，主教练肖爱山却把她调到自己的训练组，并作为重点训练对象。他信任她冷静敏捷的头脑、清晰的空中感觉，还有不惧场、不服输的冲劲。他预言：“只要训练对路子，今后的世界冠军是周继红。”

肖爱山点燃了小继红的激情火焰。湖南的冬季集训结束后，她赶往北京参加全国跳水冠军赛。教练肖爱山唯一的儿子重病住



周继红和启蒙教练肖爱山

院，但他只去医院匆匆看了儿子一眼，就带着她及其他队员乘车北上。

肖爱山不是铁打的心肠，他何尝不疼自己的孩子呢？此刻之所以这样决定，他考虑的是小继红在冬季集训中进步特别明显，有可能在这次比赛中冒尖，她临场更需要教练的“照料”。否则，一旦因准备不好临场闪失，将使她从此失去信心，就会像刚从地下冒尖的春笋，被石头压住不能破土而出。

肖爱山的决定是正确的，小继红在这次比赛中，正是因为有他的临场指导，夺得全国女子跳台跳水冠军。

16岁的小继红，手捧金牌高兴地蹦跳到肖爱山面前说：“给您，给您的儿子小海亮吧，他看到金牌病就会好的！”

肖爱山没有接这块金牌，他希望她将来拿到奥运金牌时，再一起分享胜利的幸福。

蓝天振翅

1981年，周继红入选国家集训队。她的视野进一步打开了，成长道路有了广阔的前景，技术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提升。别看平时嘻嘻哈哈的样子，但在训练方面非常刻苦认真，钉是钉，铆是铆，一点也不敢马虎。

周继红发扬在湖北队训练的一股硬劲，水里岸上不停折腾自己。她把国外跳水名将的长处优点记在心里，时刻准备着向她们挑战。同时，她注意吸收队友的好方法及先进技巧，不断规范和完善自己的跳水动作。

就是靠着这么一种拼命精神，周继红一步步成长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第二年，她再登全国女子跳台跳水冠军宝座，并获世界跳水锦标赛跳台跳水第三名和亚运会跳台跳水第二名。

1983年4月，在美国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杯跳水赛上，周继红面临一批咄咄逼人的世界强手，发誓“决不把金牌让给外国人！”尽管她在预赛中跻身前五，但在决赛前几轮又落他人之后。她不急不惧，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紧追，誓把几乎已到别人手中的金牌抢回来。最后，她勇登跳台跳水首席，轰动了素有“跳水王国”之称的美国。

周继红的跳水已进入到神奇境界，正如一首描写《跳水》的诗中所写：“从十米高台，陶醉于下面的湛蓝，在跳板与水面之间，描画出从容的曲线，让青春去激起，一片雪白的赞叹。”

但是，人生都有遇到瓶颈的时刻。周继红经过连续频繁的比赛，似乎到了疲劳的极限，落下的训练课目似乎无法弥补起来，技术似乎也有些停滞不前。在第五届全运会女子跳台跳水比赛上，她令人吃惊的掉至前

三名之外。这还不说，随后接连多次在重大国际比赛中失利，怎么也恢复不到最佳水平。在新西兰、澳大利亚的两次国际跳水邀请赛上，她的成绩均不理想，差一点影响到参加奥运会。

当进军奥运会的决战之鼓越敲越响之时，国家集训队的一些老将和后起之秀，一个个被预测为金牌的有力争夺者，唯独不见周继红的名字。可她毕竟是一个钢铁铸就的硬姑娘，在多次失败面前毫不气馁，依旧每天训练不止。她给肖爱山教练写信说：“现在，我是拼了命练，每堂课都尽最大的努力，一定争取在洛杉矶拼搏。”

锲而不舍，练得更苦，周继红终于成为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的选手。她决心以闪闪发光的金牌，报答哺育她成长的祖国。

为了训练自己的定力，周继红甚至拿起绣花针学起了刺绣。每天晚上艰苦的训

练结束后，她都要坚持绣两个小时。现在回忆这段经历，她动情地说：“那是我的土办法！”

江城热潮

周继红在举世瞩目的奥运会上为祖国立下功勋，有记者问她：“听说你当时一入水就笑了？”她回答：“是啊，一入水就知道自己成功了，应该拿冠军了。”

中国游泳协会名誉主席薄一波当天致电中国体育代表团，热烈祝贺周继红夺得奥运会女子跳台跳水金牌。

湖北省、武汉市政府在第一时间致电中国体育代表团，祝贺周继红为国立新功。周继红夺冠后的半小时，武汉市长吴官正到她家祝贺，对她父母说：你们的女儿为国家和民族争得了荣誉，这是你们的光荣，也是武汉人民的光荣。

当天的《长江日报》在充分报道的同时，专门配发了短评《学习周继红 勇创“第一流”》。

周继红全家在欢乐的气氛中陶醉了。中央电视台一播出周继红夺金的消息，她的小弟弟就在地上翻了几个滚。母亲喜泪盈眶，给几个上班的儿女打电话，激动得话都说不清楚了。

能不高兴吗？从预赛开始，全家人喜忧参半，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半夜了，小弟周建勋悄悄从床上起来，把嵌着周继红照片和奖状的镜框擦得干干净净。姐姐周立红从梦中笑醒过来，她梦见妹妹挂上了金牌。父亲周海清大早就吩咐儿子去买几挂鞭炮，对女儿的自信，使他有了预感。

周继红成功一搏，慰藉了家人，感奋了故乡人。



武汉姑娘周继红



湖北省省长黄知真（左一）为周继红等优秀运动员庆功颁奖

老教练肖爱山和曾昭美带领的报喜队刚引起的欢乐还未散去，一阵锣鼓声又响了起来，周继红母亲退休的工作单位武汉蓬垫厂送来一块横匾，上书“赠给光荣妈妈——祝贺周继红荣获奥运会跳水冠军”。

母亲激动得泣不成声，她忘不了当年一家老小九口家大口阔，组织上一直关怀着周继红的成长，几乎负担了女儿的全部生活费，使这一棵苗苗得以茁壮成长。

父亲周海清说，女儿取得了成绩，是党和国家的荣耀，我们也感到安心了。

8月11日、12日两天，周继红家门前的天津路，被前来庆贺的人们堵塞了交通，真是歌如潮、花似海。她的母校和各级领导，也纷纷送来贺匾慰问。

一位邻居说，在这条曾经是外国人租界的街上，竟出了一个战胜“洋人”的小丫头，真了不起呀，我们作为她的街坊怎能不欢乐无比呢？一些素不相识的老乡，你掏五毛钱、我拿一块钱买鞭炮，一遍又一遍燃放

起来。他们说，周继红是我们湖北武汉人民的光荣，她代表我们向祖国献了份厚礼。我们值得为她欢呼，我们值得为她热情地燃放鞭炮。

8月30日，湖北省委、省政府盛会欢迎周继红等运动员凯旋，宣布了对周继红、余建玲、韩爱萍等记功和表彰的决定。省长黄知真在欢迎会上说，周继红、童辉、张健、王红兵、涂光明、沈勇进、彭波和余建玲，在奥运会和国际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是全省人民锐意进取、开拓前进的生动体现，对全省人民进一步开创各项工作的新局面，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和鼓舞。省委、省政府希望全省各条战线的同志们，向体育健儿学习，树立为国争光的远大志向。

碧波追梦

周继红结婚后，为了支持爱人、羽毛球名将田秉毅，在家相夫教子5年。



2018年5月16日，周继红在武汉参加国际泳联第21届跳水世界杯新闻发布会 李葳摄



2020年，周继红与东京奥运会中国游泳队合影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后，中国跳水队遭遇空前的人员危机。周继红临危受命，执掌中国跳水队，开始了人生的另一段辉煌。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1999年世锦赛，周继红带领团队夺得10枚金牌中的9枚。而后，又陆续培养出伏明霞、郭晶晶、田亮、熊倪等众多明星级运动员，让中国跳水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梦之队”。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跳水队差一点大包大揽，取得了8枚金牌中的7枚。3年后的上海游泳世锦赛，中国跳水队囊括了所有10枚金牌，成为世锦赛历史上第一支成就“大满贯”的跳水队。

竞技体育格局日新月异，周继红带领中国跳水队，一直霸气地扛起“梦之队”大旗，意味着拿冠军是最基本的、是没有悬念的。其实，她面临每场比赛都提心吊胆，每个冠军都来之不易。她自己并不认可“梦之队”称号，更愿意称之为“拼之队”。

周继红是一位个性鲜明的女子，也是一位强悍的教练和领队。58岁的她，就是乘风破浪的“大姐大”，实力与运气，造就了她的辉煌人生。

1994年，周继红入选“国际水上名人堂”，成为第一位入选的中国运动员。2017年11月，任中国游泳协会主席。2018年8月，入围第二届国际奥委会终身教练奖候选人。2019年1月，任中国奥委会委员。2020年1月，任中国跳水协会主席。2021年6月，当选国际泳联副主席。2023年10月，任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主任。

昔日从武汉走出的小姑娘，迎着波涛续写大传奇。

陈晓桥，武汉市体育局机关退休干部

一名城建人的成长路

◇ 王 飞

人物名片：王飞，九三学社社员，注册规划师。供职过武汉市规划研究院、武汉市规划设计公司、中建三局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现任中建三局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我从小就是武汉城市建设的发烧友，长大有幸成为一名城建人。就像歌曲里写的那样，“我在大大的城市里面，挖呀挖呀挖，种大大的种子，开大大的花”。种子，就是我工作十多年参与编制的各种规划，是我作为民主党派人士报送的一篇篇社情民意。这颗种子，有幸与许许多多的种子汇聚一起，就有了今日武汉美轮美奂的城市建设。

少时的记忆：长江上要多几座桥该多好啊

1980年，我出生于武汉市硚口区的一家中型国营工厂宿舍。少时绝大部分的衣食

住行都能在工厂大院解决，出门的机会很有限。只记得小学春游是要坐交通车去东湖的，必走长江大桥。每每经过这座1957年建成通车的万里长江第一桥，心头就有一丝小小的激动。“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不仅是伟人的名句，也是我们武汉人的骄傲。

后来有次随爸爸去青山的小姑家，没走长江大桥，一路上公交换轮渡，轮渡再换公交，兜兜转转一上午就过去了。我暗暗感叹，要是在汉口和青山之间能有座长江大桥多好啊！

1995年，我读初三那年，长江上第一座特大型预应力混凝土斜拉桥——长江二桥通车了。长江二桥正式通车前几天，允许市民上桥免费参观。当时桥上人潮如涌，短短三天参观者超过百万。

1998年，武汉市经受了长江特大洪水的考验，我也经历了高考选拔进入武昌马鞍山畔的大学校园。宿舍住了来自天南地北的



武汉长江大桥、长江二桥依次在江面上排列

八位兄弟，作为唯一的本地人，我忍不住给室友们介绍起了武汉。不过还没等我说完，室友们就七嘴八舌地说开了：

“我从武昌火车站出来，一路看起来，武汉破破烂烂的，不愧是中国最大的县城”“武汉在全国城市 GDP 的排名是十五名，无锡、宁波、大连、青岛都比武汉强”“武汉公交车司机真凶，开起车来不要命”“马路上好多人力三轮车，是不是叫麻木啊？”“读完大学，我们肯定不会留武汉的”……听到这些，我只能尴尬地一笑。

青春的奋斗：我参与了武汉市总体规划编制

经过四年路桥专业本科和三年交通规划硕士学习，2005 年，我入职武汉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交通市政所。工作不久，便有幸参与了《武汉市总体规划（2010—2020

年）》交通板块的编制工作。少时那些熟悉的街道和桥梁，化身为一条条道路红线，成了我工作的底图。

在六大新城组群方向构建“双快一轨”的复合交通走廊，引导城市空间拓展。2020 年在主城区建设“3 环 13 射”的环射快速路网、约 282 公里长的轨道交通网、11 座过长江通道。目前这版总体规划提出的重大交通设施均已建成。如今长江对武汉人来说不再是天堑了，而是大江大河大武汉的城市展示面，是夜幕下多姿多彩的灯光秀，是老人们的健身公园和孩子们的游乐场。

2010 年 3 月 8 日，《武汉市总体规划（2010—2020 年）》获得国务院审批。总规提出“两轴两环，六楔入城”的全域生态框架，通过大东湖、武湖、府河、后官湖、青菱湖、汤逊湖等六大绿楔，反向约束城市空间的无序蔓延。这一极具前瞻性的规划设想，使得总规荣获国际城市与区域规划师学



王飞工作照

会（ISOCARP）“全球杰出贡献奖”。

不过这版总规也有少许遗憾。对搞交通规划的人来说，最大的遗憾就是沿用了上世纪90年代末确定2号线（汉口火车站至关山）的走向，并未予以调整优化。这条23公里长的武汉首条过江地铁，串联起汉口和武昌几乎所有的商圈，承载了太多的功能。自通车之日起，高峰时段2号线就是人满为患，服务水平堪忧。

在进行总规编制的2005年，武汉市GDP在2000亿元左右，全年投入城建资金约100亿元，能保证的轨道交通建设资金只有20亿元。当时估计需要七八年时间，举全市之力建设2号线，预测之后很多年不会有新的过江地铁线。但武汉城市建设的力度出乎意料。2010年后，武汉常年有近十条地铁线同时施工；2013年全市在建工地超过一万个，时任市长阮成发被取外号“满城挖”；2016—2019年，武汉的轨道交通投资额稳定在400亿元左右，轨道4、7、8号线均实现了过江。

2019年10月18日晚20时，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开幕式在武汉体育中心举行，中央电视台进行了全程直播。当年七嘴八舌

说武汉是大县城的室友们，相约在同一时段看直播。看到开幕式镜头中展现的大武汉崭新城市面貌，几个室友忍不住说：“没想到武汉发展得这么好，有点后悔当年没有留在武汉工作。”看着微信群里的这几句话，我的视线有些模糊了，那一夜我是带着微笑入睡的。

中年的薄发：献计江城建设

2018年3月21日，我光荣地成为一名九三学社社员，从此有了一个为城市发展建言献策的新平台。

2021年7月19日，河南郑州遭遇强降雨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针对如何减小未来极端降雨对武汉城市圈的负面影响问题，我通过对郑州和武汉降雨强度的对比研究及暴雨成灾特性分析，撰写了社情民意信息《关于建立武汉城市圈同城化暴雨即时速报系统，编制各城市暴雨日行动指南的建议》，呼吁通过加强防灾教育等一系列举措来化解极端降雨对武汉城市圈各城市的危害，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针对目前武汉轨道客流强度整体偏低和二号线占比过高这两大问题，我撰写了《切实推进轨道11号线武昌段建成开通，弥补运营轨道网重大缺陷，缓解武汉新城方向交通拥堵》信息。通过分析武汉轨道网布线和设站的特点，指出东湖高新区的轨道未高效融入全市轨道网是重大缺陷。结合省委省政府积极推进武鄂黄黄和武汉新城建设的指示，我提出尽快建成开通轨道11号线武昌段，同时研究提升轨道交通出行分担率等系列举措。

针对2023年起房屋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断崖式下跌对湖北省建筑业的冲击，

在深入调研中建三局多家二级公司的运营情况后，我撰写了《关于助力湖北省建筑业渡过难关、可持续发展的建议》信息。提出各级政府协助建筑业对拖欠合同款的情况进行追讨，保障本地建筑企业的合法权益；充分利用现有宽松的金融环境，在建筑行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落实省内政府投资项目的资金保障；建立重大项目本省企业优选承包制，定向帮扶本省建筑企业共克时

艰；积极推进促进武汉、襄阳、宜昌城市圈一体化，推动武鄂黄黄——武汉新城建设和实现城市更新类项目的开工建设，实现以工代赈。鼓励省内建筑企业出国远征，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利用行业下行期，对建筑行业发展进行引导，鼓励建筑企业实现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最终实现整个建筑行业的提档升级，等等。

2021年，我撰写《统筹规划建设同城化交通设施，加快城市圈同城化发展》提案。针对目前武汉城市圈交通设施对同城化支撑不足、跨市轨道交通建设困难重重、各城市间道路规划建设缺乏统筹、现行高速公路收费制度不利于同城化发展等规划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建立同城化交通设施建设协同机制、建立城市轨道交通申报融资建设一体化机制、开展武汉城市圈高快速路系统建设规划及标准研究、积极推进已有交通设施的同城化升级、制定城市圈交通设施的收费优惠政策等一系列建议措施。该提案入选省政协重点提案。

2022年10月19日，省政协副主席、



作为提案执笔人与省政协副主席秦顺全院士交流

九三学社中央常委秦顺全院士率队赴武汉东湖高新区，就该重点提案开展督办调研。秦顺全实地了解黄石（武汉）离岸科创园建设运营和武鄂“硬联通”道路项目建设情况，提出要着眼加快武汉都市圈发展，高标准统筹规划交通设施。2023年，省交通运输厅牵头推进武鄂黄黄快速道路系统建设全面启动，通过“三横三纵”构筑武汉都市圈“硬联通”。

对此，我深感慰藉。加入九三学社六年来，我共撰写、提交社情民意信息与提案数十条。其中的每一个问题与建议，每一处分析与表述，都经过了深思熟虑、精心打磨，凝聚着我对城市建设发展的深切关注和为民请命的热忱。如今，这些字句不再只是纸上的文字，它们已经成为改变现实的强大力量，激励着我继续前行。

红色“徐家军”（上）

◇ 刘祖书 徐光思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鄂东北大地，在残酷的土地革命斗争中，诞生、锻造了一支英雄的革命队伍，这就是以徐海东为领头人的“徐家军”。自 1927 年 10 月组建农民自卫军，到红二十五军西征抵达陕北，在长达八年的艰苦岁月中，“徐家军”数百人紧随徐海东辗转作战数千里，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其英勇事迹在大别山广为传颂，英名闪耀在祖国灿烂的星空。

依靠自家人，组建“徐家军”

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徐海东在党组织安排下，离汉返回黄陂家乡，开展革命活动。同年 6 月，被中共黄陂县委任命为河口区农民自卫队大队长，领导打击地主反动武装。“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河口区区委决

定农民自卫队分散活动。徐海东返回徐家窑，以窑工为掩护，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11 月 13 日，黄安（今红安）、麻城三万余名农民自卫军和义勇军，在中共湖北省委领导下，攻打黄安县城，打响了鄂豫皖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右派的第一枪，史称“黄麻起义”。

中共黄陂县委急令河口区农民自卫军赶赴黄安参加暴动。接到命令后，徐海东动员几名当过兵的窑工，连同原来的自卫队员一起，组成一支 27 人的农民武装，奔赴黄安参加战斗。暴动胜利后，徐海东带去的农民自卫队员编入新成立的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他应邀参加 11 月 18 日举行的黄安县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大会，受到鄂东革命军副总指挥吴光浩的接见。

徐海东汇报河口区农民自卫军情况后，吴光浩要求他当即返回河口区，迅速集结失



徐海东

散的队员。徐海东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但要求把带来的7支钢枪一同带回去。吴光浩则表示，鄂东军刚成立，最需要的也是枪，要用它来保卫新政权。于是，徐海东只身重返家乡，准备再次组建一支革命队伍。

建立队伍的关键是要有人，前期好不容易组织起来的骨干队伍都送走了，想要再迅速组建一支新的队伍，人从哪里来呢？为了党的事业，为了革命的胜利，徐海东打算积极动员徐氏家族的远亲近邻，着手组织一支“徐家军”。

徐海东首先想到的是几位哥哥：大哥虽然年纪大了，但他有3个儿子能扛枪；二哥单身一人，无牵无挂，只是有点胆小怕事；三哥倒是胆子大，敢打敢拼，就是好不容易娶了妻，偏偏不生养儿子，夫妇

俩整天念叨着要有个传宗接代的娃儿；四哥有文化，有人缘，有活动能力，找他说说，没准能得到他的支持；五哥徐元波是个性格刚直、大胆的汉子，在村上 and 窑场好打抱不平。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经过徐海东逐一做工作，亲兄弟们很快都加入了“徐家军”。

在四哥徐元海的动员下，堂兄弟徐元洪、徐元大、徐元庆、徐元兴，还有几个嫂子和侄子徐文初、徐文阶、徐文亨、徐文东、徐文治、徐文朗等，也都陆续参加了“徐家军”。不久，徐海东的小学同学、舅家表侄吴正刚加入。徐海东的姥姥家在邓喻咀，也是他宣传动员的重点。在徐海东、徐元海的秘密串连下，舅舅吴学恒、吴安全等18人积极参加到“徐家军”队伍中来。

徐海东媳妇田德斋娘家叫杨仕边，离徐海东家只有几里路，塘里的人大都也是以烧窑为生。徐海东是田家的姑爷，同样是至亲，比较好做工作。这个村子的田忠恕、田



1927年10月，徐海东在新城水竹沟组建13人的罗（山）（黄）陂孝（感）农民自卫军



1927年11月初，“徐家军”夜袭雨坛寺，建立革命武装

忠昌、田忠道一帮子小弟兄13人，也来参加了“徐家军”。

得到家门长辈、兄弟、子侄辈和乡亲父老们的支持，徐海东信心倍增。就这样，一支“徐家军”“窑家将”的队伍秘密发展起来了。

县委授红旗，成立“徐家军”

1927年底，徐海东见正式组建“徐家军”的时机已成熟，便向黄陂县委书记陈金台汇报。陈金台高兴地称赞了“徐家军”，表示三天后自己就去窑场，代表党组织向他们授旗。

12月27日，陈金台安排人连夜缝制一面鲜红的布旗，并用金黄色的线绣上“徐家军”3个大字。28日一大早，陈金台穿着一身阔气的衣服，扮成教书先生的模样，将红旗小心翼翼地卷在怀里。他从河口出发，凭着机智勇敢，顺利通过了反动势力巡逻队的层层盘查，到达新城集市。在一家饭馆吃罢

夜饭后，趁着夜色，抄小道直奔徐海东与窑工们所在的窑场。

夜幕降临，陈金台来到窑工们聚集的地方，用暗号敲门。徐海东迅疾起身迎接这位年轻的县委书记，随后，向徐家的窑工们介绍了陈书记，并宣布组建“徐家军”。

陈金台庄严地走向窑工们提前搭建好的讲台，从衣袋里拿出一支粉笔，在墙上用正楷写上“徐家军”三个大字。这一晚，在窑场，

在油灯下，陈金台、徐海东与窑工们热烈地讨论着中国革命的形势、鄂豫边区革命的前景。会议中间，陈金台取出藏在怀里的红旗，郑重地铺放在窑工用的桌子上。随着“徐家军”3个大字呈现在红旗上，呈现在窑工面前，大伙抑制不住兴奋欢呼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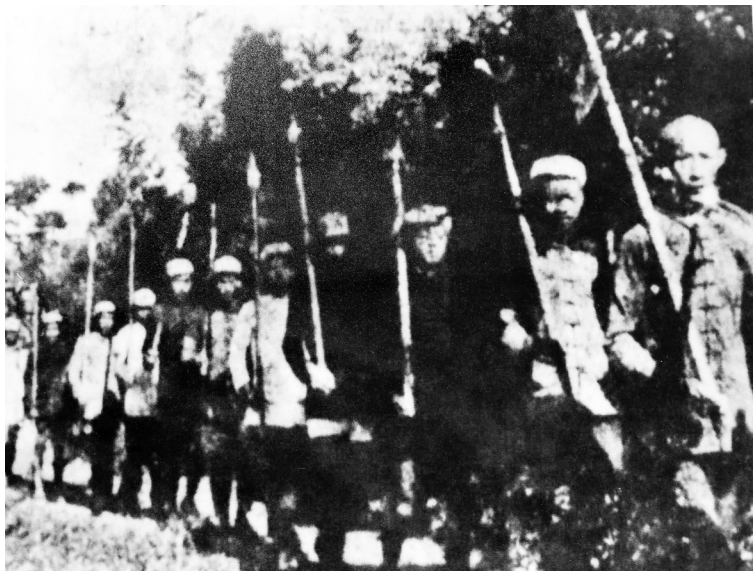
在正式成立“徐家军”的大会上，参会的有徐海东的曾祖父徐大明，堂叔父徐重荣，四哥徐元海、五哥徐元波，堂兄弟徐元兴、徐元庆、徐汉才、徐元大、徐元典、徐德，侄子与堂侄徐贵安、徐么平、徐文亭、徐文朗、徐文阶、徐文治、徐文雄、徐贵金……这30人，几乎都是窑工，大多姓徐，且与徐海东是同族。陈金台命名这支农民自卫队为“徐家军”，真是名副其实的“徐家军”。

这一年从春天到冬天，徐海东利用已组织起来的“徐家军”，积极培训骨干，并通过骨干号召家人、亲邻投入革命斗争。到1928年冬，“徐家军”已发展到100多人，徐海东的各方亲戚，还有窑工们都纷纷加入其中，发展势头迅猛。

1928年底，黄陂县委通知徐海东准备组织“年关暴动”，利用已组织发展起来的“徐家军”做好发动群众的工作。徐海东部署完夏区的暴动工作，又连夜赶回徐家窑，当晚便召集窑工支部会议，“徐家军”的骨干成员全部到齐。会上，徐海东宣布了黄陂县委的指示，并要求“徐家军”的所有队员要起带头作用，积极发动周围群众加入即将开展的“年关暴动”行列。“徐家军”骨干成员接到徐海东的命令后，纷纷想方设法联络、鼓动附近十里八乡的亲邻加入斗争。

“徐家军”骨干成员四处宣传党的政策，到1928年底，加入“徐家军”的人越来越多，人数比成立时翻了将近10倍。

1928年农历腊月三十，徐海东为首的夏区党委以“徐家军”为主体作战队伍，带领农民近千人在河背咀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年关暴动”。数百人的农民暴动队伍在“徐家军”骨干徐大明、徐元海、徐元波、徐元兴、徐元庆、徐汉才、徐元大等人的指挥领导下，打到地主老财家，开仓放粮分给穷苦的百姓。



组建“徐家军”

暴动中的“徐家军”骨干成员积极响应徐海东提出的口号：干革命就要往前冲，干革命就要勇于舍命，干革命就要用一身热血夺取敌人的武器消灭敌人！这次行动使得“徐家军”威名远播，远近前来参加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不仅有农民，还有各地的工人等一批革命积极分子，真可谓星星之火，已呈燎原之势！

血战红土地，名扬鄂东北

徐海东领导的游击队下还有支队、分队，这些支队分队也是“徐家军”重要的组成部分。不管是徐海东直接领导的游击队主力，还是下面的支队、分队，在建立、发展、战斗过程中都以“铁血”著称，他们的“铁血精神”成就了铁血的“徐家军”。

1929年2月，徐海东领导的“徐家军”游击队为打击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夜袭阳平口豹子岩，消灭何垮包民团13人，缴获长枪13支。这是“徐家军”成立以来，第一次以准军事手段消灭敌人、夺取武器来壮大自己。在这次战斗中，徐海东拿着大刀指挥“徐家军”，队员们舍生忘死地战斗，直到把反动民团消灭干净。这一仗，“徐家军”自身没有受到损失，还积累了战斗经验。

5月10日，黄陂北乡境内的江竹青率红军特务队与仙居区赤卫队联合，分两路夜袭曾家岗一带的“铲共会”，歼灭64人。徐海东听闻此消息备受鼓舞，便带领“徐家军”在河口、夏店、新城一带不断进行游击战斗，消灭了当地不少的反动武装。

5月15日，徐海东率领“徐家军”到夏店罗家边开仓济贫，包抄大地主李良奎的家，将李家百余石粮食及衣物分给当地的穷苦农民。“徐家军”还就地歼灭万刘家咀红枪会9人，彻底打垮了红枪会这一当地的反动势力，为穷苦百姓出了一口气。

同年7月，黄陂北乡境内共产党人刘家炼、曹静安、梁明朗等不幸被捕，敌人用尽酷刑，他们宁死不屈，13日敌人将他们杀害于黄陂县城小东门外河滩上。7

月17日，敌夏斗寅之十三师七十三团包围仙居区况家河村，逼迫乡民交出共产党员被拒绝后，杀害乡民况春国等7人，烧毁房屋多间。

当时徐海东领导的“徐家军”正在河口、夏店一带边打游击边发动群众，敌人四处寻找徐海东及“徐家军”活动的根据地，准备抓而杀之，以此威慑与镇压境内日益兴起的革命运动。

徐海东听闻境内这么多共产党人与乡民被害，顿时义愤填膺，准备组织“徐家军”找到杀害共产党的罪魁祸首，狠狠地打击敌人。正思索如何寻机歼灭敌人时，夏店吴家湾游击支队队员徐玉先找到他们所在根据地，面见徐海东，告之河口张维生手下的张棍子带领民团在夏店等地大悟山区一带强征强收，残害乡亲，枪杀党员与群众。

徐海东听取汇报后，认为这是难得的围歼敌人的机会。8月，徐海东令徐大明带领几个骨干成员连夜返回徐家窑，召集附近的游击支队，准备汇合河口、夏店、新城3处的“徐家军”游击队百余人对张棍子二三十人的反动武装进行围歼。



徐海东故居

一天，张棍子及其反动民团成员在夏店谢家湾收完税后，到集镇一处酒馆据点大吃大喝起来。徐玉先得此情报，当即面陈正在夏店大悟山一带组织队伍的徐海东。徐海东安排“徐家军”队员分成七队，化装成卖柴的普通百姓，把枪、刀等武器藏在柴火里，急速向夏店集镇推进。

队伍到达夏店集镇后，已至傍晚，便分散隐蔽在酒馆附近，只等夜色垂暮。当晚，七队“徐家军”队员在徐海东指挥下，端枪举刀破门而入，反动民团二三十人正在酣睡，还未来得及反抗，就被“徐家军”队员们一窝端了。

这次战斗中，“徐家军”缴获数十支钢枪，自身力量更为强大。也正是经此一战，红色“徐家军”的大名在鄂东北大地彻底打响。

刘祖书，大悟县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徐光思，大悟县老促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崇真尚美，用纯粹的心剪裁服饰的美

◇ 孙菊香（口述） 章旷怡（整理）

人物名片：孙菊香，市政协委员，洪山区人大代表，武汉纺织大学教授，纺大惟尚服饰品牌创始人。系中国美术家协会服装设计艺术委员会委员。

坦白而言，我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经营者，而是一个喜欢钻研专业的服装设计师。很多时候我都习惯沉浸在自己的创作世界里，内心纯粹，做出来的东西就会干净。一旦进入到创作状态，其他的杂念会统统消除，很专注的时候会感觉自己不再是自己，许多灵感也会突然迸发。每一根线条，如何让它充分体现人体美；材料如何更飘逸；工艺如何更精湛；如何运用美学规律塑造完美形象等等。哪怕是差一点点，也要不断调试，调到最完美的状态。

所以我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做服装也是一种修行，越是追求完美，越是觉得痛苦。

为服装设计而生

在我快要出生时，父亲曾去归元寺数罗汉。当数到一个拿着红布的罗汉时，父亲心中断定，这个即将诞生的孩子一定是女娃。没想到后来，我接了妈妈的班，成为一名服装设计师。也许是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在之后的人生中，服装设计不仅成为我无法割舍的爱好，更成为我终生追求的事业。也许我，就是为服装而生的。

喜欢做服装，是从妈妈那里得到的启蒙和遗传。妈妈十八岁时就学习做服装，开过一家裁缝店。她没有太多文化，也没有学过专业，但是手非常巧，给人量体从不用尺子，用手一掐，做出的衣服就很合体。这就是天赋和眼光。

从小我就浸染在布料、裁剪、刺绣之中，一边看一边学，在小学四年级就会为自己剪



2015年3月，北京中国国际时装周现场

裁和制作简单的衣服。小时候一放假，别人都出去玩，我就在家专心地裁剪服装，非常痴迷，干很长时间。在外面逛街时，看到工艺美术商店里的工艺品，也会一直盯着看，看人家苏绣怎么绣的，看编织工艺品材质的美感和工艺的特点。

那时的我，还是一个在数学课上偷偷画图，因为奇装异服被老师教育的女孩。直至高中时，我选择了美术，心中对美的渴望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不记得有多少次醉心画画忘了时间，有时半夜被老师赶回宿舍睡觉。那时的热情用不完，画多晚都不觉得累，因为实在是太喜欢美术了。

带着这股劲和对服装的热爱，1985年，我报考了西北纺织工学院（现西安工程大学），当时的西纺是国家纺织部的重点院校，我是它招收的第一批本科生。非常幸运的是，当时有一批留法的老师给我们授课，这些老师学贯中西，有着先进的设计理念 and

际视野。此外，还有一批裁剪功底扎实的老师，他们严谨的工匠精神和认真钻研的态度，深深影响着我们。至今还保留着朱君明老师运用数学推理公式做款式结构图的方法，我的数学不好，但对服装类的公式却过目不忘。

在西纺，我们学到了关于服装设计的系统理论知识。当时我的成绩不错，连续四年全班第一，1989年还获得首届中国青年时装设计大奖赛金奖。大学毕业后，我回到武汉，在武汉纺织大学做了一名教师，但

是一天都没有放弃和停止过服装设计，总是一边教书，一边实践与研究服装。

2000年，香港理工大学的校友林大辉先生拿出一笔钱，赞助内地服装行业优秀教师去该校学习深造。全国有十个名额，学校就把我推荐到那里读研。香港的服装业与国际接轨早，设计理念和技术都很先进。那里经常举办服装设计大赛，我都积极参加，获得第六届香港杰出青年服装设计师“形象设计”大奖赛金奖。

毕业后，我几乎每年都会特意飞到香港进行考察，甚至到欧洲学习知名品牌的设计理念。以前觉得世界大牌每个都好，每个都有亮点。十几年过去，发现已经很难在国外知名品牌上找到更多的设计共鸣。当值得学习的目标品牌越来越少，就要发挥我们本土的特长，去创造、创新，让我们的作品赢得世界的关注。这也是中国服装设计成为引领者的机会。

为“惟尚”品牌而谋

从香港理工大学读研归来后，我在武汉纺织大学创办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服装设计工作室。2009年，又创办定制品牌“纺大惟尚”，英文名是“FADVSUN”，想传递出一种简洁、大气、优雅、时尚的设计理念。衣服也是一种语言的表达，越简洁的衣服看起来越美，越不会被淘汰。就像一首诗寥寥几个字就会觉得很有意境，但把它写成说明文，就觉得繁杂无趣了。

早年的高级定制工作室生存较为艰难，既需要富有创意的设计师团队，还需要高水平的制版及工艺师团队。由于设计定制各方面要求高且定单数量少、过程繁复，一般企业很难负担大量的研发经费，多数企业都选择了批量生产成衣。

我们是为数不多能做到设计定制的品牌，顾客来了之后，我们可根据顾客需求及个人特质，如肤色、体型、气质等提供个性化设计。如：参加重要比赛的歌唱家、演奏家，演出服要符合人物性格，更要服务现场表演作品；重大活动的主持人，礼服要符合主题精神，还要体现个人魅力；身居要职的企业家，服装不能过多修饰，但要体现气质与身份。我们始终遵循的准则是：最好的衣着是记不住这件衣服，而是记住穿衣人的优雅气质。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纺大惟尚已经成为知名的服装定制品牌。除了为歌唱家、演奏家、主持人、企业家等定做高端礼服，也为青歌赛、春晚、外交部湖北全球推介活动等大型活动量身定制服装。武汉军运会的接待服装，我们也参与了设计。我亲手设计的服装，见证了许多人士一生中重要的时刻。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是平面裁剪，缝衣必绣。将绣品文化融入到生活美学，这是我为纺大惟尚规划的未来发展方向。很幸运的是，儿子对服装设计的绣花要求特别高，不亚于我，他特别安静，能沉下心来。在“习莫会晤”东湖宾馆接待服、在制作军运会上使用的服装刺绣上，他熬了不少个通宵，但未见半点抱怨。

他们这代人更擅于运用科技，知道怎么用新技术赋能传统服装业。他常常将机绣和手工绣花进行结合，机绣相当于要在电脑上绣一遍，用代码编写一个程序，先绣什么，再绣什么，哪根线压哪根线；还要做实验，测试稳定性，看不同面料呈现的不同风格，最终达到手工绣的效果，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

在这个宇宙间，人是很渺小的存在。这辈子我的目标就是把品牌基础打好，做顾客喜欢的衣服，把接班人和团队带好，再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把纺大惟尚做成百年长青品牌。

为汉派服装坚守

纺织是武汉的传统产业，“汉派”服装是武汉的一块招牌。上世纪90年代初期，凭借起步较早的产业结构和九省通衢的地理优势，汉派服装以大众化、平民化的风格逐步名扬海内外。那时，汉正街一些商铺采用前店后厂的模式售卖服装，款式新颖、价格实惠，广受欢迎。全国的客商争相采购汉派服装，然后运到全国各地销售，汉派服装风靡一时。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我其实是汉派服装的第一批老设计师，可以说是汉派的元老。1989年本科毕业后，我曾兼职担任汉

派服装企业的设计总监，有十余年之久，亲身经历了汉派服装发展最辉煌的时刻，也为当年汉派服饰引领全国潮流作出了贡献。1994 和 1996 年，我蝉联首届及第二届汉派服装设计大奖金奖；1996 年，又获得汉派服装设计大奖赛“金剪奖”第一名。

那时，为了专心设计，我经常就是睡在工作室里，所设计的服装为企业带来了不菲的利润，设计款式卖几万件都很常见，有些甚至还卖过 30 多万件。有很多武汉的本土品牌都模仿我，甚至在北京和上海的批发市场，也见到许多模仿的款式。但我也从来没有追究过这些，既然他们关注我，那我就慢慢向他们传达一种正面的理念，让他们知道衣服的品质好，才会有真正的市场影响力。设计服装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设计理念，我永远坚守一个原则：宁可在创新中失败，不可在保守中成功。

2017 年，我当选为武汉市政协委员，拥有了建言献策、参政议政的渠道。结合自身对服装行业的了解，我一直在为武汉打造时尚之都积极建言，呼吁武汉本土文化建设，强调工匠精神必须贯穿始终，从而打造国内、国际具有影响力的“武汉品牌”。

在 2023 年的武汉“两会”上，我提交了《关于培育一批工匠型创新服饰品牌推动汉派服装再次崛起的建议》提案。建议政府挑选一批有潜力和后劲的设计师和品牌进行帮扶，起到带头和示范作用，带动其他汉派服装品牌的共同崛起。

首先要看品牌是否有工匠精神，是否热爱服装事业，以把服装做好作为第一目的，能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而不是以赚钱为第一目的。做有情怀的事业，有文化的产品，有温度的服务。这样能避免走以前的老路。以前很多汉派品牌赚了钱后，觉得



孙菊香设计的作品

其他行业更赚钱，都去做房地产、酒店了，很多都改行了。

其次，是否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是否以创新为主，做高品质、高端产品为目的。特别是要有鲜明的品牌特色，把产品形象放在首位。汉派服装衰落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在 2010 年后，相互抄袭、同质化现象特别严重，最后失去了品牌的个性与特色。

对曾经辉煌过的汉派服饰，我依然充满期待与梦想。汉派服饰逐步衰落，主要还是缺乏创新，而汉派要重新崛起、走向世界依然要靠创新。依托政府的支持和设计师的工匠精神与创新精神，汉派服饰完全可以重振辉煌，走向世界，甚至引领世界潮流。这是我们这一代服装人的使命。

珍惜人生际遇 不负使命担当

◇ 鲍惜光

人物名片：鲍惜光，汉南区政协委员，武汉经开区智能网联和电动汽车产业园三级主任科员。

履职三年，我对身为政协委员的职责和使命担当越来越清晰，更深切感受到政协大家庭的关爱和培养。是政协给了我成长的舞台、突破自我的勇气和不断前行的力量。

少年启蒙，与政协结缘

2021年，对我而言是特别有意义的一年，在民盟经开区工委的推荐下，我成为汉南区政协委员，这是我人生难得的际遇。第一次参加汉南区政协全体会议时，我抬头仰望庄严的会徽，五角星光芒闪耀，周围是红

色缎带连接起来的瓦蓝色齿轮和金黄色麦穗，寓意着中国人民的大团结大联合。那一刻我深感自豪，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心中激荡，不禁回想起少年时期对政协的朦胧认识。

上中学时，我的数学老师就是一名政协委员。有一次，我偶然看见老师在文稿纸上写材料，便好奇地问道：“您不是教数学的吗，怎么还写作文？”老师说：“我除了教书，还是政协委员，我得听民意、做调研、写提案。”我继续追问：“什么是政协委员？”老师想了想，用我能听懂的语言回答：“就是要关心学校外面的世界，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当时的我并没能理解政协委员是什么，但老师的话启蒙了我的认知，在我稚嫩的心



在汉南区政协组织的“生态环保”专题读书分享会上发言

灵深处埋下了一个美好的憧憬：长大后我也要像老师那样，成为能做更多有意义事情的政协委员。

成为政协委员后，我的世界打开了另外一扇窗，多了一片施展抱负的新天地。然而，最初的激动过后，却产生了一些茫然和惶恐。特别是第一次参加分组讨论时，委员们的精彩发言有情怀、有水平、有价值，始终紧扣国家的大政方针，围绕武汉经开区工委、管委会的决策部署，为党和政府推进各项工作开拓思路、提供支撑。那股团结热烈的氛围触动了我的思想、振奋了我的精神，但知识储备不够、综合能力不足的压力也随之而来。

委员读书，在政协成长

履职之路充满挑战，但我也充满信心。为了提升自己的履职能力，我十分注重学习，除重点学习政协理论知识外，也涉猎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和政治学等领域的知识。汉南区政协持续拓展“书香政协”的内涵和外延，推动读书与委员履职深度融合、相互

赋能，我也努力把读书收获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工作成效。

在精读完《黄金水道：长江经济带》一书后，我积极参加区政协组织的长江大保护调研，撰写《涵养长江文化根脉，赋能绿色经济发展》文章，2023年9月在汉南区政协暨民盟武汉经开区工委读书会上，分享了我对这一课题的思考与探索，相关建议得到有关部门肯定。

在参加政协组织的各类活动中，我结识了不同界别的英才俊杰，从更多渠道获得信息和资讯，开拓了思路 and 眼界，也感悟到委员履职并不都是“单兵作战”，对于自己关注而知识储备较少的领域，可以参与到专业人士的课题研究中，与委员们团结奋进，相互赋能，共同成长。

特别是老一辈政协人教会我，群众的“关键小事”就是委员的“履职大事”。2022年5月，区政协举办委员培训班，专题学习人民政协工作者的光辉榜样、原汉南区政协副主席匡宗仪同志的模范事迹。老领导艰苦朴素的作风、高风亮节的本色、干事创业的热情让我深受感动，也让我认识到，作为政协委员必须有无私无畏的担当精神，倾听来自城市各个角落民众的声音，传递民众的愿望。

同时，作为一名政协委员，不仅要积极参与各种调研活动，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珍惜每一次了解民意、反映民愿的机会，也需要关注其他委员的观察视角与工作方法，使自己提出的对策建议符合客观实际、符合群众意愿，具有可操作性。

投身实践，在政协履职

从2017年在武汉经开区智能网联和电动汽车产业园管理办工作以来，我始终将“店小二”服务理念，贯穿服务企业和职工的全过程。当选政协委员之后，我把委员履职和本职工作相结合，努力在自己熟悉的工作领域，寻找切口小、关联广、涉及企业和职工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

我所工作的园区是武汉经开区工业经济的主战场之一，企业职工3万多人，有很多非本地户籍职工居住在厂区宿舍。这些职工数量众多、分布较散、流动性大，也与本地居民一样，有着政务办理、生活服务、子女教育、精神文化等方面的需求。

针对这个现象，我撰写了第一份提案《关于推行居厂职工社区化服务的建议》。该提案被列为区政协十届一次会议第3号重点提案，相关建议被职能部门采纳，推动形成了“企业—社区—园区”信息服务机制，提升了居厂职工的服务效能。这让我深刻感受到党和政府对政协委员提案的重视，自己可以通过政协平台，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

随后，我积极参与汉南区营商环境、社区治理等课题研究，撰写的《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体系的建议》遴选为区政协十届二次会议大会书面发言；《加快智慧社区建设，提升“智慧”民生服务能力》遴选为区政协十届三次会议大会口头发言；《关于推动数据充分共享，打造更优营商环境的调研报告》为协同调研监督工作提供参考。

随着武汉经开区加快培育“绿色生产力”，一座座现代化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与区内的山明水秀相互融合。鉴于此，

我撰写了《关于发展新能源汽车工业旅游的建议》，并积极推动园区内整车企业申报工业旅游项目，助力“硬核工业”邂逅“诗和远方”。

2023年，在文娱场所消费复苏的背景下，我了解到群众对公共场所卫生健康的关注，于是向医药卫生、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委员们请教，积极参与他们课题研究，形成联名提案《关于加强文娱场所传染病公共卫生风险管理的建议》，助力文娱场所卫生监督、公众健康教育等工作提升。

在履职实践中，最可贵的是能近距离感受到政协工作者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展现的风采与担当。汉南区政协围绕抢抓湖北省打造“汉孝随襄十”为重点的万亿级汽车产业走廊战略发展机遇，报送《关于全力打造车谷产业创新大走廊的建议》信息直送省委有关领导参阅，助推区内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和新型工业化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引起社会各界对中国车谷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广泛关注。

这也激励着我以更宽广的视野去思考时代课题。我专注本职工作领域，认真研究我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情况，调研多家整车企业生产经营实际情况，围绕我市成熟汽车产业链和数字产业优势进行分析，执笔《关于加快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的调研报告》，被民盟武汉市委转化为市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民盟界别集体提案。

在参政议政上的热情和自觉，也使我得到区政协的认可，2023年评为汉南区优秀政协委员。但我深知，自身能力还有很多需要提升的地方。要进一步加强学习，慎思明辨，笃行致远，不负我们身处的时代。

芯片征途上的冒险之旅

◇ 范陈杰（口述） 许 濛（整理）

人物名片：范陈杰，武汉市南通商会副会长，湖北省江苏商会副会长，武汉拓尔奇光电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汉电子智能制造协会会长。

知足常乐，是传统中国人秉持的信念。大多数人追求的也是这样安安稳稳，平平地和地度过一生。但是于我而言，生活是一场试验，是高低起伏不可探知的旅程，是跌倒与爬起的交错，需要闯过一道又一道关口，每一次的闯关都增添新的生命体验。

中国首批芯片应用推广人

1985年7月，高考落榜的我进入了我们当地的启东计算机厂。这是国内首家从事IC集成电路（芯片）应用推广的乡镇企业，

1982年由启东五七农场与上海复旦大学计算机学院合作开办。

当年，启东计算机厂因把葛洲坝船闸控制由纯机械改造成MCU（微控制单元，又称单片机）自动控制而一炮打响。这也是中国自动化控制应用的开端，为中国步入自动化时代以及步入芯片应用时代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我也成为中国首批芯片应用推广人。

为巩固专业知识，工作之余我花了两年时间，在启东市广播电视大学函授学习完所有课程，对集成电路有了更深入更系统的了解。

90年代初，启东的MCU单片机开发工具、单片机教学实验仪已享誉全国各大高校和各企业研发部，形成“单片机=启东、启东=单片机”的格局。



1987年，范陈杰（左）在启东计算机厂门口

1993年初，受单位委派，我来到位于广埠屯电脑一条街的武汉销售部，从事单片机开发工具的推广销售。相比南通，武汉的饮食口味既重又辣，夏天气候闷热，初来乍到的我诸多不适。幸运的是遇上了在隔壁门市部经营五笔打字培训的本地姑娘万群心，更幸运的是日后她成为我并肩同行的战友，携手相伴的亲人，开启了我武汉的新生活。

1996年，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国有企业面临严重挑战，大批下岗人员走向社会，我也成为其中一员。好在在武汉积累了3年，手上有一些客户信息，让我能留在武汉继续干下去。当年9月，我在广埠屯电脑城三楼租了2个柜台，注册了第一份工商营业执照“武汉市启东电脑服务部”，开启我的个体户创业之路。

在那个市场粗放的年代，加上我本人性格内向、少有言辞，更不

会酒桌牌桌的应对，在充满人情世故的武汉市场环境中，生意做不起来，勉强只能养活自己。好在隔壁爱人的打字复印店开得红红火火，撑起了全家所有的开销。

杂志上翻出的芯片代理

随着社会的发展，对芯片的认知、应用越来越广。特别是芯片在沿海一带企业得到了广泛应用。但市场上使用的都是初级的、低端的英特尔的八位MCU微处理器，而且都是双列直插芯片，包含资源很少，只能做一些简单的电子产品。

为此我一直在想：如果能从“芯片的开发工具推广”改变到“芯片的推广”，就能实现产品升级换代，同时更适合我腼腆的性格，只用专注技术，不用应酬，那该多好啊！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积极参加各种集成电路研讨会，寻找各种集成电路杂志，终于在杂志上捕捉到一则消息：美国英特尔的MSP430系列超低功耗十六位MCU单片机和美国芯科的C8051F系列高速八位MCU单片机，正在寻找国内代理商。



1998年范陈杰在华师电脑城前留影



华中电子市场十周年合照（前排左一为范陈杰）

经与商家多次沟通，我在两个星期内成功拿下了湖北区代理。事后得知，此前武汉有两家芯片销售商跟他们沟通了好几个月，价格上一直没有谈妥；而我在沟通中从未谈过价格之事，所以一谈而就。实际上，我想只要争取到产品代理，产品能大量推向市场，价格根本就不是问题。而一旦产品推不出去，价格谈得再低也没用。

签约后我志得意满，2003年6月注册成立武汉鑫人达电子有限公司，并投入十多万元进了第一批货，相比老产品性能更卓越、速度更快、功耗更低。但现实给我浇了冷水，想尽各种办法产品都很难销售。调研后发现：客户习惯使用直插封装的芯片，便于更新维修；而这两款芯片，都是贴片封装，没人会贴片焊接，所以不敢使用，怕后续没法维修升级。

为此我频繁往返于深圳、苏州和华中科技大学集成电路学院，向这个领域的行家、教授请教，编写出《关于贴片集成芯片的手工焊接规范》。这份手工焊接规范的推出，彻底解决了客户的顾虑。

此时我又得知华师大校门两侧门面要拆了重建，这意味着电脑一条街华师一侧的

原商户都将无法经营。我立即带头组织广埠屯十家做电子芯片贸易的商户，将当时经营很不景气的华中数码城二、三楼整层包了下来，对外招租，结果一下子爆满。从此，我们自己的“华中电子市场”一直兴旺了十多年。

随后几年里，公司业务迅速扩展，在电力设备、医疗设备、三表（电表、水表、气表）领域、射频通讯等行业纷纷开

始提出新方案，研发使用我们代理的芯片，中原电子、三江航天、各大高校、722所、709所、717所等陆陆续续成了我的客户。在湖北地区的电子行业可谓一举成名，很快就挤入了武汉电子贸易行业的第一阵营。

延伸产业链跨过5千万这道坎

我身上有种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2009年，公司从七八人已发展到二十多人，业绩稳步增长。但我知道所有的竞争优势都是暂时的，“天晴更适合修屋顶”。

那个年代很多小企业都面临招技术员难、产品开发难的困境。我抓住这个痛点，迅速成立“电子产品研发部”，提供研发业务，此举迅速吸引了一大批客户。

与武汉地区做电子芯片代理贸易的前辈、同行交流时，我又发现一个共性问题：一定阶段后公司产值很难跨过5千万这道坎！究其原因，那个年代武汉是重工业城市，国企偏多，工控产品偏多，品种多小批量，很难像沿海消费品那样每月百万级大批量生产。

如何破局？思量后我决定再次延伸产

业链。2009年5月，我在江夏租赁近1000平方米厂房，组建完整的SMT表贴焊接产线，开始进军SMT表贴焊接行业。由于对SMT一窍不通，只能边做边学，质量问题不断，学费交了不少，直到工艺趋于稳定，成为武汉地区唯一的“电子产品研发+电子料配单+芯片焊接加工+调试组装”一站式ODM特色服务公司。

2011年初，我在武汉的富士康车间里，兴奋地看到两台西门子激光剥线机，准备用于生产第一代苹果手机。此时国内还没有研发并生产激光剥线机的厂家。光谷不缺专业人才，我马上行动，很快组建了近十人的研发团队，计划在两年内将产品独家、批量推向市场。

但人算不如天算，看起来很简单的东西，要做好做稳做细却很难。2014年8月才出第一台样机，精度还是不理想。此时，深圳的大族激光、武汉的凌云光电都宣布他们的新产品“激光剥线机设备”可以对外销售了。半年后，我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含泪解散了激光剥线机项目的研发团队。好在原先的积蓄和电子产品一站式ODM业务，勉强支撑起了激光剥线机项目的亏损。

自主终端产品敲开海外市场

2013年，我顶着经济压力购买了位于光谷电子工业园里3500平方的厂房。有压力就有动力，我不再满足于原有的贸易和代工业务，开始探寻新的产品。

光谷的设备配套企业中，做激光器、电源、钣金机箱的很多，激光焊接切割时需佩戴保护镜，国内只有三四家企业生产，而且只是简单的通过镀膜方式来挡住一部分有害光。而国外早就有“自动变光电焊防护



光谷电子工业园的4层厂房

面罩”，保护强光下作业人员的眼睛、皮肤免受激光伤害。

自动变光技术所依靠的电控部分是我们的强项，光部分研发由华中科技大学光电学院的几位教授提供技术支持。历经两年，2017年底，公司的自主产品——第一代“自动变光激光防护面罩”面世。

我把武汉、苏州、东莞的激光行业跑了个遍，市场结果却很不理想：一是嫌价格太高，二是国内自我保护意识不强。我不得不转战海外市场，2019年开始利用阿里巴巴、中国制造、亚马逊等平台做外贸，积极参加专业的焊接展会，同步伴随着突破研发、品质提升的种种壁垒，一步一个脚印，陆续赢得德国、美国、加拿大等欧美中高端市场客户的订单。

跟芯片比，电焊面罩产品属于庞然大物，更大面积的厂房需求迫在眉睫。我老家南通启东位于长江口北侧，离上海浦东机场90分钟车程，离通州港50公里。基于交通物流优势和家乡情结，2021年我在启东高

新技术开发区购地自建了2万方厂房。2023年初启东工厂建成投产。

电焊面罩属于小众市场，全球一年的市场也只有20亿元左右，仅单一面罩市场的空间有限。经调研，我发现全球焊机的年需求达到400多亿元，而焊机与电焊面罩属同类客户。我迅速聘请专业人员组建焊机研发团队，一年多的时间形成了系列焊机产品。

随着新工厂的投产，产品品质稳定提升，以及两大产品线逐步稳定，通过线上线下渠道了解到我们的客户越来越多，从欧美延伸到亚非拉，从中小型贸易商拓展到领先品牌代工订单。作为直接面对消费者的终端产品，我在ODM业务稳步增长的情况下，坚持自有品牌运营，只有更贴近市场，才能更懂市场。

加强研发实现自主自造

2016年搬迁至电子工业园的新厂房后，公司以一个全新形象出现在行业视野中。SMT表贴焊接线从1条扩到了3条，THT插件线也从不太完整的产线扩到了2条，电子产品一站式ODM业务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根据经验我预测，国产集成芯片终将是市场主流！我先行一步，从微处理器、模拟器件、电源管理器件等全系列推行国产集成芯片，在武汉开先河，开始艰难的国产IC集成芯片推广之路。

彼时的推广并不顺利，武汉企业生产的是工控产品，量小利润高不在乎成本。国产芯片虽然比进口芯片便宜15%，但他们觉得贵一点的进口芯片用着放心、省心。

直到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国产集成芯片行业意外迎



启东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工厂

来了机遇。在“自造不如进口”的环境里，大部分的同行早已被迫转行。这次美国的制裁，激发了中国芯片自主自造的决心。我的国产IC集成芯片推广业务一路飙升，订单激增。

做了一辈子的芯片应用推广、电子产品一站式ODM业务，有一个自己的芯片的愿望越来越强烈。2007年想试水，苦于武汉完全没有芯片设计封装测试等一系列的产业和资源，只好放弃改做了SMT表面贴装焊接。现在就完全不同了，虽然封装测试厂相对沿海是少一些，但从高校出来的芯片设计人员却很多。

2022年，我在上海张江成立芯片设计公司“上海神龙芯微电子有限公司”，前期专门设计MCU微处理器，后期扩展至模拟器件、电源管理器件等。2023年年底，第一款神龙芯SLX32L083系列MCU微处理器的流片、测试都通过了，今年开始推向市场。明年将有更多的芯片（温度补偿芯片、计量芯片、光耦芯片等）逐步面世。

我离我的国产芯片梦更近了！

救亡漫画宣传队与黄鹤楼大壁画

◇ 姚馨语

1937年冬，日军攻占南京，国民政府首脑机关西迁武汉，武汉实际成为“战时首都”。全国优秀文学家、美术家、戏曲家、音乐家汇集于江城，武汉无疑成为全民族抗战文化宣传的中心。

“漫宣队”在武汉壮大

救亡漫画宣传队组建于1937年9月，全称是上海市各界抗战后援会宣传委员会漫画界救亡协会漫画宣传队第一队（简称“漫宣队”），著名画家叶浅予、张乐平为正副领队，队员有胡考、特伟、席与群、陶今也、梁白波、张仃、陆志庠、张光宇等画家。上海沦陷后，“漫宣队”途径南京集体西行，1937年11月21日抵达汉口落脚在大和街（今胜利街郝梦龄路至黄浦路段），后搬到武昌水陆街武昌艺术专科学校。

1938年4月，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

第三厅在武昌昙华林成立，掌理抗战宣传事务，由周恩来副部长负责，郭沫若为厅长。三厅第六处第三科管美术，徐悲鸿为科长（倪貽德代理）。“漫宣队”直属三厅第六处第三科，驻地也迁到昙华林。在此前后，廖冰兄、张大千、李可染、赖少其、罗工柳、李桦、傅抱石等著名画家来到江城。

“漫宣队”是武汉美术界的核心堡垒，成员上百人。大家将自己的艺术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创作了大量美术作品，点燃了中华儿女同仇敌忾的抗日热情，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将民国时期的美术事业推向了顶峰，谱写了武汉现代美术史空前绝后的一页。

1937年岁末，国民外交协会举行抗战漫画摄影展览会，刚到武汉的“漫宣队”就提供50余幅作品。12月18日，“抗敌画展”在汉口、武昌两地展出，200余幅作品参展，展期10天，5万多人参观。12月23日，“全

国儿童抗敌漫画旅行展览”在汉口民众教育馆举行,展出作品 100 余幅。1938 年 1 月 8 日至 10 日,七月社在武昌民教馆主办“抗战木刻画展”。

李桦的《被枷锁着的中国》(也称《怒吼吧!中国》)是这一时期抗战木刻的经典



《被枷锁着的中国》

符号。作品用粗壮有力的刀锋,刻绘出一位裸体男性被麻绳捆绑在木桩上却双手抓握、张嘴怒吼的不屈形象。这件作品,用极度抽象概括的绘画语言进行画面处理,生动塑造了一个被压迫但顽强抵抗的中国民众代表。作品极具震撼力,表现民族危亡的困境与国人抗争的决绝,呼唤同胞觉醒与侵略者抗争。

1938 年 4 月 7 日至 13 日,武汉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战扩大宣传周”,其中 10 日为“美术宣传日”,“漫宣队”把数百幅抗战宣传画陈列在黄鹤楼故址两侧的台阶上,还在三镇大街小巷的醒目处绘制许多巨幅壁画、漫画、宣传画。晚上,各美术团体燃起火炬,高举《总动员》《还有谁没有加进队伍》《保卫家乡》《杀敌》《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再上前线》《打回老家去》等

数百幅宣传画和数十名抗日将领的画像沿街游行,气势壮观,鼓动性很强,受到市民热烈欢迎。



“抗战扩大宣传周”大游行中的画家队伍

7 月 7 日是全面抗战一周年,在“七七阵亡将士纪念碑”奠基典礼布置会场,美术家绘制了不少号召抗日军民继承阵亡将士遗志、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的宣传画。

《抗战漫画》在武汉创刊

漫画是现代美术中最通俗的一个画种,作画工具简单,表意浅显通俗,即使文盲也能一看就懂。画面所具有的讽刺性、幽默性、鼓动性、普及性,在艰苦的反侵略战争中,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罪行,激发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有力推动了全面抗战的文艺救亡运动,发挥了其他画种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938 年元旦,全国性抗战美术刊物《抗战漫画》在武汉问世。半月刊,16 开本,每期 24 页,每册一角二分。内容以漫画、木刻为主,兼有照片。社址位于汉口交通路 62 号,由“漫宣队”成员担任编辑,全国

漫画家协会负责出版发行，上海杂志公司总经销。

“漫宣队”创作了《全民抗战》《不愿做奴隶的同胞们起来了》《民族英雄故事》（连环画）《筑起我们新的长城》《保卫家乡》《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站在日军前面的巨人——游击队》等许多作品，仅“保卫大武汉”题材的宣传画就有多幅，从各个角度鼓舞全国人民投入反侵略战争之中。这些作品多半采用白描笔法，以黑白对比强烈的粗线和块面，营造美术形象，极具感染力，十分震撼人心。

“漫宣队”唯一的女画家梁白波的《妇女参战》格外引人注目。当时形势非常严峻，



《抗战漫画》创刊号封面（叶浅予作）



《妇女参战》

40万日寇逼近武汉，前线一再告急。这幅作品一扫笼罩在中国上空的战争黑云，展现一位充满阳光的中国女性，高扬起双手唱着

“春天到了！”“只要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春天就永远是我们的了！”相较于大多抗战绘画的硬朗粗犷，这幅作品线条流畅优美，白描圆润柔和，构图饱满、风格清新，以女性独有的情愫表现了对胜利的向往，鼓舞中国妇女行动起来。这幅作品，后来选送到苏联展览。

《抗战漫画》伴随武汉抗战，到1938年6月16日共出版12期，1940年5月15日在重庆复刊。

黄鹤楼大壁画在武汉诞生

1938年夏天，日军逼近武汉，我国军队在周边与日军殊死搏杀。为了激励全国军民斗志，三厅决定在黄鹤楼故址的城墙上绘制巨型武汉抗战壁画《全国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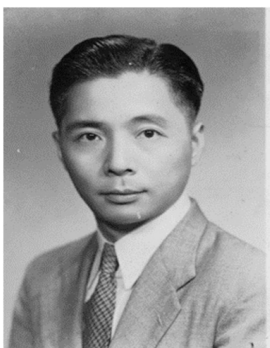
左图《大家起来保卫中华民族和国土》（廖冰兄作），中图《保卫大武汉》（佚名），右图《站在日军前面的巨人——游击队》（白波作）



左图《刀尖上的舞蹈》（梁中铭作），中图《“战争病患者”的末日》（张竹作），右图《支撑不住》（廖冰兄作）



田汉



倪贻德

动员》(亦称《保卫大武汉》《抗战到底》)。黄鹤楼是武汉标志性建筑,曾耸立在长江之畔的蛇山之上,为名传四海的名胜古迹,在其脚下宽阔巨大的石灰色城墙上绘制壁画,能产生震撼人心的巨大艺术效果。

黄鹤楼大壁画,由周恩来领导、郭沫若为厅长的三厅策划,在田汉的具体组织下完成。田汉,《义勇军进行曲》(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词作者,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掌管艺术宣传的三厅第六处处长,为武汉文艺抗战的领军人物。他号召每一个有血性的画家,走出“象牙之塔”“走向街头,走向农村,走向抗战的前线。他们将在美术战斗中感到自己的画笔不仅可成为抗战的武器,同时也是建国的武器。新的中国会在我们的画笔下产生出来!”

大壁画最初领衔的设计者是倪贻德,笔名尼特,中国现代派绘画的先驱人物,1932年创立现代艺术社团决澜社,任第六处第三科代理科长,主管美术。他被武汉炙热的抗战气氛和画家的抗战创作热情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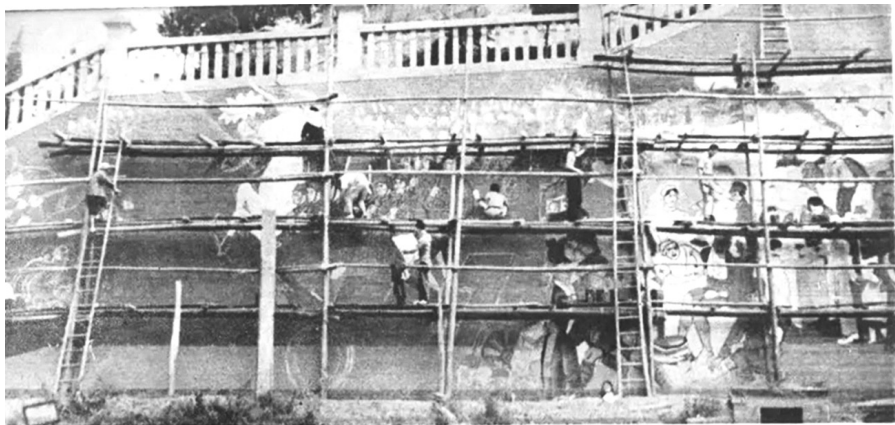
感染,激情地写道:“战时的武汉完全可说是美术化了,整个的都市就宛如一个大的展览会场。不论在街头,在闹市,在车站,在轮渡码头,到处都张贴着色彩强烈的,线条粗犷的宣传的招贴,布画、壁报、标语,以及大幅的壁画。各团体的美术工作人员,像在竞赛地表现着艺术的伟大力量。”

大壁画以漫宣队与决澜社为主力,集中了30多位美术家。先由倪贻德、周多、王式廓、李可染等商讨构图,设计出总草图后,分成若干部分画稿创作绘制。

绘制这幅“雄视江汉”的大壁画,面临巨大挑战。首先,宽阔巨大的墙壁高约12米、宽约45米,只得用粗木料搭起三层高架,通过云梯上去,铺上木板站立作画。有的地方太高够不着,就用绳子挂一个梯子,再绑上小凳子,从栏杆翻到悬着的小凳子上作业,不时悠一下晃来晃去接着画。

时值盛夏,有火炉之称的武汉烈日当空,墙壁晒得发烫,大家“只戴草帽,背上晒得像针扎一样地疼痛;汗流浹背,毛巾湿透了,拧干了再用,实在受不住了,就下来站在墙阴角里唯一的一棵树下,喝几口水,喘几口气,再爬上脚手架继续干!”

绘制期间,武汉会战鏖战激烈,敌机



黄鹤楼大壁画绘制现场

不断狂轰滥炸，画家时常从三层高架上跳下钻进防空壕，晚上没有敌机的空隙就挑灯夜战。郭沫若不时到现场慰问，出谋划策。田汉则冒着高温现场督导，指挥协调。

大壁画8月13日开始绘制，9月4日大功告成。整幅高约12米，宽约45米，创下了近代中国最大壁画的奇迹。

它以磅礴的气势，彰显全民抗战的宏伟图景，“欢送战士上前线”“慰问抗日战士”“挖战壕”“抬伤员”“运弹药”等场面，由300多个军民形象组成，人物几乎都是“等身比”大小。

大壁画的内容划分左右两大部分。

左面约占三分之二，主体是前线怒潮一般冲向日军侵略者的战士，机械化部队、炮兵、通讯兵投入战场，轰炸机和战斗机升上蓝天轰炸敌军阵地；一群护士为伤员治伤包扎，一群父老乡亲在掘挖壕沟，一群童子军携带担架为伤兵服务……表达我国全民保家卫国、战斗必胜的精神。

右面约占三分之一，主体是后方团结一心的爱国民众，妇女小孩向前传递粮食物资，老人手持针线缝补制作军衣，广大市民纷纷捐款，社会名流发表救国演讲，较远处还依稀可见山林之中在修桥筑路……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形象鲜活反映在画面上。

这部凝聚了全国30余位画家智慧与心血的伟大视觉艺术，是抗战时期不同画派艺术家携手共进的见证者，表现了中华民族抗日总动员“前方作战”和“后方支援”的历史场景，突显民族意志与现代艺术的完美结合，展示了“新的艺术革命”和“艺术大众化”的重要内涵。



黄鹤楼大壁画《全国总动员》（局部）

大壁画在绘制过程中，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新华日报》1938年9月26日发表密林的文章《抗战中的美术工场》，中央通讯社记者蔡述文和美国著名摄影师罗伯特·卡帕拍摄了绘制现场，中国电影制片厂新闻纪录片《抗战特辑》摄录电影，给历史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影像资料。10月25日武汉沦陷后，倪貽德29日在香港《星岛日报》发表文章《黄鹤楼的大壁画》，《天下月刊》英文版11月《朝向艺术的一个新理念》刊登陈依范摄影的黄鹤楼大壁画，上海《大美晚报》11月刊出“抗战壁画特辑”，赞扬这一美术史上伟大作品的独特贡献。

日军占领武汉后，黄鹤楼大壁画仍然矗立在长江之畔，抗议日军侵华暴行，昭示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坚强意志。

黄鹤楼大壁画具有史诗般的艺术力量，它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背景下，由中国共产党人主导，团结大批爱国艺术家集体绘制的不朽杰作。它象征着武汉作为战时文化宣传中心的艺术符号，留下了武汉革命史和艺术史上的荣耀一页。

姚馨语，湖北美术学院2021级学生

大使夫人组办中国民乐演奏会 ——武汉杂技团三次炫技法兰西之三

◇ 何忠杰

1991年10月，武汉杂技团第三次访问法国。这一年，虽然中法关系因法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而受到严重损害，可法国观众喜爱中国杂技的热情依然如故。对中国文化怀有深厚感情、对武汉杂技团情有独钟的隆布罗索先生，本打算邀请武汉杂技团携熊猫“英英”赴法商演，但因濒危动物进出口手续难办，熊猫未能随行，但我们在巴黎“冬季马戏场”的上座依然火爆。

10名演奏员亮出民乐盛宴

驻法大使蔡方柏和夫人安征都是武汉人。1965年，蔡方柏大使作为黄镇大使的

秘书和翻译，参与指导武汉杂技团首访法国的演出活动；夫人安征则作为随团医生，为我们做医疗保健工作。大使夫妇对家乡来的艺术团和夏菊花既熟悉亲切又信任有加。他们一方面邀请法国各界友好人士观看杂技表演，一方面组织各种活动联络感情、增进友谊，团结对华友好人士。这次访演，不仅杂技表演取得了圆满成功，还配合使馆举行了一场民族音乐演奏会。

1991年11月下旬，我们接到驻法使馆通知，大使夫人安征想请武汉杂技团民乐队在大使馆举办一场中国民族音乐演奏会，招待法国政府官员夫人及社会名流。

这无疑是一次具有外交使命的演出，

仅有10名成员的民族乐队，在做好每周9场演出的伴奏之余，克服种种困难，准备独奏、合奏曲目，抓紧时间进行合练、排练，整合出一台具有一定水平的中国民族音乐演奏会节目。

作为新中国杂技综合艺术重要表演形式，武汉杂技团坚持以民族音乐伴奏，运用独具特色的民族器乐演奏出动听的音乐旋律，为杂技表演营造了富有艺术感染力的音乐情绪，给观众带来美妙悦耳的视听享受。因而，武汉杂技团民乐队是一支具有丰富经验和演奏水平的专业团队，其中唢呐、笙、笛子、二胡、琵琶等演奏员都具备独奏水平。

12月19日，这场特别的音乐会在大使馆大厅举行。大厅金碧辉煌的长廊，匠心独运地铺上一条鲜花夹道的大地毯，两壁墙上大理石雕、金色吊灯与鲜花怒放的盆栽交相辉映，古色古香中弥漫着典雅华丽的浓郁艺术氛围。

出席音乐会的大多是法国上层社会名流，其中有法国前总统蓬皮杜的夫人，时任

外交部长杜马的夫人，政界、外交、文化界的高官夫人，以及各国驻法大使夫人和女外交官。法国前总统蓬皮杜是西方阵营中第一位访问中国并受到最高礼遇的国家元首，这些高官夫人的出席，使演奏会现场的气氛显得更加隆重热烈。

蓬皮杜夫人钟情中国简谱

音乐会从民乐合奏开始，演奏员身着传统的民族服装，为来宾演奏了精心挑选的中国民乐名曲：二胡独奏《二泉映月》《赛马》，笛子独奏《姑苏行》《催马扬鞭运粮忙》，琵琶独奏《赶花会》《春江花月夜》，笙独奏《孔雀开屏》，高胡独奏《蕉林喜雨》，唢呐独奏《正月十五闹花灯》《百鸟朝凤》，民乐合奏《紫竹调》《织出彩虹万里长》等。这些曲目既有古典民乐经典，又有现代民乐杰作，既有苏杭小调，又有广东乐曲。出乎意料的是，每个节目演毕，台下嘉宾都报以热烈掌声。

在灿烂光影中，许多女士随着乐曲的节奏轻轻晃动身子，如轻波微浪，进入如痴如醉的境界。音乐无国界，其感染力超越了时空。没想到，我们杂技团不仅能用中国杂技征服巴黎观众，我们民乐队也能在巴黎举办高规格的音乐演奏会，尽显中华民族音乐的风采。

音乐会一结束，蓬皮杜夫人和杜马夫人首先登台向乐队队员致意。乐队演奏员和他们手中的乐器，也被一群达官贵妇包围，久久不



蔡方柏大使和夫人安征（后排中、右一）与夏菊花（前排左二）及小演员等合影

愿离去。她们对中国乐器抱有强烈好奇心。一般西洋管乐，无论是铜管还是木管乐器都是单管，可中国的笙却是多根竹管组成，不仅可以演奏旋律还可以演奏和声。演奏员孙友伍用笙又吹奏了一小段曲子，令她们觉得奇妙无比。她们还惊奇地盯着演奏员胡兰英手中的二胡，蓬皮杜夫人通过翻译和胡兰英交谈：一般西洋弦乐器小提琴、大提琴都是四根弦，你们中国的弦乐器二胡、高胡只有两根弦，也能奏出这么美妙的音乐，真是不可思议！杜马夫人说：“中国音乐是对世界文化的贡献！”

蓬皮杜夫人表示，希望得到一份中国民乐简谱，因为西洋乐一般都是用五线谱，而中国民乐大都用简谱，这也是嘉宾们兴趣之所在。乐队指挥朱永辉满足了蓬皮杜夫人的要求，事后将一份手抄简谱赠送给她。蓬皮杜夫人收到大使夫人安征转交的简谱后，回复了一封亲笔感谢信，安征特意将感谢信送给民乐队以作纪念

中国民族音乐、乐器、乐谱这些中国元素的特色文化，都引起嘉宾们的好奇心。许多人纷纷表示，她们在一小时中，仿佛听到雨打芭蕉的声音，又好像看到北国万里雪飘的美景，如同再一次旅游中国。法国国立高等音乐师范学院教授弗朗索瓦兹·巴罗昂莱女士，从专业角度给予这场音乐会以高度评价：“音乐会让我们享受了中国民族音乐之美。”

翌日，巴黎《欧洲时报》以“中国驻法大使夫人组办民乐招待会，法国各界名流到会，演出大获成功”的栏目标题，详细报道了这次别开生面的音乐会。大使夫人安征十分高兴地表示：这是中国驻法使馆开馆以来第一次举办中国民族音乐会，它的成功，说明中国文化艺术的伟大与灿烂。



这场高规格的招待会，通过传播民族音乐文化，无疑有益于增进中法友好关系，民乐队演奏员为此而兴奋不已。

在中法友好关系60年的不平凡历程中，武汉杂技团的三次赴法访演，发挥了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情谊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我们为此感到荣幸和欣慰。

何忠杰，原武汉杂技团副团长

1900 年汉口德租界堤防码头工程揭秘

◇ 范 榕 胡全志

100 多年前，外国人在汉口江滩修筑了防水墙和驳岸。100 多年后，武汉人把汉口江滩改造成天下一流的江滩公园，世界为之瞩目。

《江岸区志》（2009 年）记载：“1861 年后，英、德、法、俄、日等国相继在汉口开辟租界，并在沿江修筑红砂石驳岸、滑坡、码头、‘江踏子（礅礅子）’。由于各行其是，所修驳岸高度不一，结构各异，质量亦殊。1865 年，英租界开始在其江段修筑堤防，当年，沿江半英里长的首段堤防完工。1896 年，俄租界也修筑了堤防。1898 年，德国在其租界内沿江 0.75 英里长的江段修筑堤防，次年 5 月 30 日，德国普鲁士亨利王子为德租界堤岸奠基。1901 年，法租界着手修筑堤防。该堤防虽然较英、俄、德短，但工程最为壮观。至此，四国租界占据的江岸全部筑了堤防。稍后，日租界也修建了 400 多米长的堤防。”

新近发现的一份 1900 年 10 月 20 日发行的德国《中央建设报》合订本上，刊载了一封德国注册建筑师发给该报的信件，信中阐述了他负责主持当年汉口德租界段堤防修建工程的过程，具有一定史料参考价值。我们运用翻译软件译出大致梗概并略作删节，借此为武汉租界史及城市史提供参考。

建筑师肖恩泽的私人信件

《中央建设报》在第 504 页配发有一幅通栏照片，说明是：“中国汉口扬子江边德国分公司视图”，拍的是德租界一带堤防全景。

镜头从下游方向往上游方向拍摄，岸上近景处是一座围有院墙的公司建筑，旗杆上似挂有美国国旗，院墙上写有“美孚”“油栈”等字样。远景处是一中式翘檐建筑，应是位于一元路附近的通济门城楼。报纸全文



《中央建设报》第 504 页截图 范榕供图

没有“租界”一词，分别用“分支”和“分公司”表示。据查阅资料，德租界堤防工程交由德汉公司（或是德华银行）施工，故此，文中出现的“分支”“分公司”，可作“租界”的代名词来理解。

文章标题为《关于位于中国汉口的德租界分公司的码头建筑》，前有一小段编者按，大意是：关于中国汉口德国租界的执行情况如下。政府建筑师肖恩泽（Schönsoe）在1900年8月4日向我们提供的私人信件，附有引人入胜的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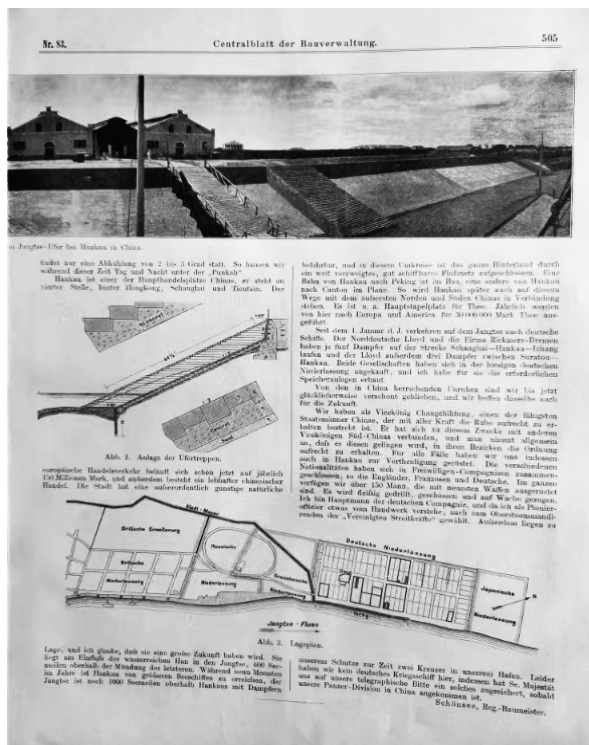
1900年8月4日：“1898年12月，我来到汉口，并测量德国租界的面积，为

其建设制定计划和成本估算。1899年3月，我将草案提交柏林德华银行，然后，他们将通过审查以批准执行。与此同时，我设计江堤，侧面边界墙和楼梯（码头台阶），是用混凝土与砂岩镶嵌建造而成。11月11日，水位已经下降到江汉关水位25英尺处，所以我开始挖土并浇筑上部基础混凝土和码头墙。12月18日，水位下降到江汉关水位9英尺处，我能够开始在江汉关水位10英尺处打桩，然后我创建路堤，应用混凝土和砂岩修筑路堤。”

肖恩泽组织施工和材料采购

肖恩泽受命负责堤防建设工程，除完成设计外，还要兼顾材料采购、设备使用以及劳动管理等方方面面。那个时候的一名建筑师，基本上是全能建筑师。

“公司监事会决定今年建德租界段 1150 米长江堤中的 700 米，包括 6 组‘楼梯’，并且处理与法租界江堤的连接处，以形成整段江堤。为了打入 3.6 米长的桩，最初考虑用夯式打桩机，但后来决定采用了中



《中央建设报》第 505 页截图，附有江堤剖面及布局图 范榕供图

国建筑中使用的手推杆式打桩机。它由一块花岗岩块组成，侧面附有可供八名苦力操作的木柄。中国人有高超的技艺使用这种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事实证明它非常高效。平均而言，我公司每天有 20 个打桩机在工作，他们在不到三周的时间内就打完了所需要的 6000 根木桩。我以最简单的方式浇筑了混凝土，将 1 份水泥、1 份石灰、6 份沙子和 12 份岩屑的混合物混合并倒入模子中。这种混合物产生的混凝土对于目前的结构非常有用。水泥等材料是我从德国买的，最初装在带有铁箍的木桶里。然而，这些物资在长途运输和反复装载过程中遭受了很大的损失，造成了相当大的浪费。后来，我指定了改用铁桶交货，在这种新包装中，水泥等材料完好无损地到达。每个铁桶的成本比木桶的成本高 40 芬尼，这被较低的浪费所抵销。”

“Fafs（宝石）牌水泥运到汉口的费用是 13.10 马克。夏季洪水时期，我从中国供应商那里购买了剩余的建筑材料，如木桩、砂岩、花岗岩台阶和盖板、混凝土石块和沙子。他们可以轻松通过水路运抵。施工进度相当顺利，今年 4 月 1 日，700 米长护岸工作已竣工。工人从不缺乏，水位也相当有利，而且天气也很好。在这种情况下，整个 1150 米长的码头在今年就可以建成。工人们几乎没有执行此类任务的经验，然而，中国人的技术相当熟练且消息灵通。当他们看到国外的工作流程时很容易接近，因为别人的工作方法优于他们迄今为止所采用的。他们有一大缺陷就是没有责任心和勤奋劳动的观念，因此所有工作都受到严格的监督。然而，在欧洲的精细管理下，他们可以做得相当出色，而且，如果受到适当的对待，他们也是一批情绪高涨和善良的工人。所有

的工作都由我亲自完成，并按约定的一致的价格进行。所有的建筑材料都是我亲自购买的。我们的邻居法国人和俄罗斯人对他们的码头建筑中采取了不同的做法，这些码头建筑由一名瑞士工程师管理。他们委托中国企业家制造河岸防护结构，并提供所有建筑材料，但有过不好的经历。中国人对这样的建筑缺乏洞察力，没有按照明确的工作计划下达正确的命令，很快他们就会缺少建筑材料，有时缺少工人。总之，整个运作过程都行不通。然而，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水利工程的工作时间非常有限。”

“一般来说，低水位仅在 12 月 1 日至 3 月 1 日期间出现，不容忽视，而且更多的数据可以追溯到这个时候。此后由于雨、雪和冰冻天气，大量工作日被损失。但是，中国人对下雨极其敏感：当第一滴雨落下时，他们就跑离工作场所，赶紧下班。俄罗斯人已经在其 550 米长的码头线上工作了三年，法国人在其 350 米长的码头上工作了两年，两者都刚刚完成了基础砌筑。我们整个分公司堤防平均只需要在江堤后面抬高 1.20—5 米，为此目的，总共需要约 65 万立方米的土壤。平均输送距离为 1100 米。我购买了一台 Loeo-30 马力的机车，120 辆容量为 0.75 立方米的自卸车和 5 公里 60 厘米轨距的轨道。这些车辆分为三个施工点，一个施工点是由机动车来运土填，两个施工点是由手推的（煤矿）翻斗车沿着轨道运土填，运作得很好。开采 1 立方米土壤平均花费 17 芬尼，包括铁路材料的购买和维护成本。一名中国 Kuli（苦力）的日薪为 35 芬尼。首先，我制定了惩罚制度，并已执行了一年，江堤已经稳固，可以进行下一步施工。我在上海定制了一辆马拉压路机。我希望在 1901 年夏天完成整个分支机构堤防工程的扩建。”

肖恩泽眼中的汉口及张之洞

《中央建设报》第 505 页上方也配发了一幅通栏照片，与 504 页上的照片可拼接为一幅连续的长图。照片上左边的建筑物，经与 1908 年拍摄的一张同位置近景照片比对，确认为汉口汉堡轮船公司，建筑物上的中文是“亨宝轮船公司”“瑞记洋行亨宝轮船公司码头”。德国亨宝船行又称“汉美轮船公司”，其位置在今沿江大道三阳路口附近。另外，正文中还配有一张岸边“楼梯”施工结构图。

察看报纸上的德租界江堤布局图，可见从一元路至四唯路 700 米堤防已完工。堤段上分布有 6 个“楼梯”。第 1 个码头位于一元路德领事馆前，后来叫一码头；第 2、3 个码头位于二曜路口附近，后来叫粤汉客运码头和二码头（美最时趸船）；第 4、5 个码头位于三阳路口附近，后来叫三码头和亨宝趸船；第 6 个码头位于四唯路口，后来



修筑防水墙与“楼梯” 卢汉铁路比利时医师菲利普·斯普鲁伊特摄

叫四码头。这张示意图上，还标出汉口城墙的走向，通济门的位置约在今市政府礼堂附近。

“在汉口的住宿还是可以接受的。最不愉快的是夏天的炎热。在 7 月和 8 月期间，温度计几乎经常高于 35 度，夜间也是如此，晚上仅有 2 至 3 度降温。所以这段时间我们昼夜生活在‘棚卡’（可能指工棚）之下。汉口是中国主要的贸易中心之一，它正在崛起，位居第四，仅次于香港、上海和天津。与欧洲的贸易额已达到每年 1.5 亿马克，并有活跃的中国贸易。这座城市拥有极其优越的自然环境和通航条件，该地区的整个腹地都在支流广泛、易于通航的河网半径范围内。从汉口至北京的铁路正在建设中，还有汉口至广州的铁路也在计划中。汉口以后也将通过这条路线与中国最远的南北极相连。除其他外，它是茶叶的主要集散地。每年从这里向欧美出口价值 3000 万马克的茶叶。自今年 1 月 1 日起，德国船只也在长江上航行。北德劳埃德和里克默斯—不莱梅

（Rickmers-Bremen）公司分别有 5 艘轮船在上海—汉口—宜昌航线上运行，劳埃德公司也有 3 艘轮船往返于沪汉之间。两家公司都入股了这里的德国分公司，我为他们建造了必要的仓储设施。幸运的是，我们还没有受到中国动乱的影响，我们幸免于难。我们对未来也抱有同样的希望。”

“我们有中国最有能力的政治家之一张之洞总督，他竭尽全力维护王权。为此，他与中国南方的其他总督建立了同盟，人们普遍认为，他们将成功地维持自己地区的秩序。无论如何，我们在汉口也做

好了防御准备，以防万一。来自不同国籍的志愿者聚集在一起，如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我们总共有 150 名装备最新武器的人员。阿维尔德勤奋地训练队员射击和防守。我是德国公司的负责人，作为一名先驱的工匠，我对这门手艺有所了解，甚至连科伊南迪上校也知道，我还被选为‘联合武装部队’成员。”

“汉口位于扬子江的上游，位置优越，我相信它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它位于水源丰富的汉江入长江入江口。一年内有九个月的时间可乘大型海轮到达汉口……”

德国海军顾问提议修建

《汉口租界志》（2003）提到：1861 年英租界开辟后，占据了半英里长的江段。为了保证租界区的安全，英租界开始沿江修筑堤防。到 1865 年，共耗资 20 万海关两，沿江首段堤防完工，1896 年，俄租界也耗资 21.5 万海关两（折合当时的英镑汇率约为 2.7 万英镑）。

1895 年德租界开辟后，并没有马上着手建设。1897 年，德国海军建筑顾问、海港工程督办、著名海河工程专家佛朗求斯参观了汉口租界。他在所著《胶州：德国在东亚的领地》一书中，批评了德国政府对天津和汉口租界的漠不关心：“贴邻的俄国汉口租界里早就建起了码头，造了堆栈仓库……，更令我大惑不解的是，政府竟然同意把这些地盘无偿转让给私人公司。……天津和汉口租界目前均在私人手里。我只希望这些公司能协同制定统一的沿江交通线路，共同修筑防江堤坝。”

德国政府对此颇为重视，遂于 1898 年由德汉公司着手将租界内洼地填平，并用砂



维修码头的“楼梯” 菲利普·斯普鲁伊特摄

岩和水泥在沿江 0.75 英里长的江段修筑堤防，耗资约 26 万海关两。

《汉口租界志·大事记》记载：1899 年（光绪二十五年）5 月 28 日，德国亨利王子来汉。30 日参加德租界堤岸奠基仪式，并与张之洞进行互访，参观了护军营、武备学堂、铁厂、枪炮厂。

综合有关史料可以看到：同治四年（1865 年）英租界开始在江段修筑堤防，首段沿江半英里长堤防完工。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俄租界堤防完工，长约 772 码，耗资 21.5 万海关两。法租界耗资 15 万海关两的堤防开工。英租界首段堤防耗资 20 万海关两，俄租界耗资 21.5 万海关两，法租界耗资 15 万海关两，德租界投资最高，约 26 万海关两。

德租界堤防码头工程，1899 年 5 月 30 日举行奠基典礼，1900 年 4 月 1 日首段 700 米长护岸工程竣工，约在 1901 年全部工程完工。

范榕，武汉旅英收藏家；胡全志，武汉市政府参事

一个法国人的武汉洋务运动观察

◇ 吴 敏

《汉口三镇》是法国人弗朗索瓦·加多弗尔在清末光绪年间造访武汉后撰写的一篇长文，原载于法国战争部（法国国防部前身）主办的《殖民部队杂志》1904年第1期，同年由承印该杂志的巴黎亨利·夏尔-拉沃泽勒军事出版社刊行单行本，是当时极其罕见的专门记述武汉的法文文献。

由于彼时汉口在国际贸易上的重要地位及五国租界的“成功”发展，汉口通常被西方人视为三镇的中心，常以汉口作为三镇的代表，故该文以“汉口三镇”为题。此外，作者使用了汉口的法文释义词“L'EMBOUCHURE DU HAN”（汉水的出口），而不是更常用的法文音译词“HAN-KEOU”（汉口），有强调汉口地理形势之意。

全书内容包括六部分：一、湖广与汉口；二、张之洞总督；三、劝学篇；四、



《汉口三镇》书影

武昌（学校、工厂、铁路、欧洲租界计划、太平军起义、安全现状）；五、汉阳（政府、铁厂、兵工厂）；六、汉口（贸易、铁路、航运、租界），对三镇的地理、人口、政治、军事、经济、教育、交通等方面进行了论述，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法国人对于清末中国内陆城镇较为全面的记载。

文中关于武汉洋务运动的观察和评论，反映了西方人的殖民主义立场以及旁观中国近代化运动的傲慢态度，但他对洋务运动的封建性和腐朽性的揭示，亦不乏引人深思的针砭之辞。

新式学堂徒有其表

作者来汉之日，正是张之洞督鄂之时，因此该文用了近五分之一的篇幅介绍张之洞及其阐发“中体西用”思想的著作《劝学篇》，给予了张之洞较为正面的评价，认为他是一位清正廉洁的爱国者、抱负远大的改革家，“为了民众的福祉殚精竭虑”。

清末内忧外患之际，张之洞意图在保存纲常名教的前提下，对中国社会进行有限度的近代化改造，借以巩固摇摇欲坠的封建政权。作者指出：“他希望能把三镇打造成为一个改革的温床，辐射整个中国。”

教育改革是张之洞极为重视的方面，常言“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认为教育是国家兴衰的关键，指出“非天下广设学堂不可”，在汉先后筹办两湖书院、矿业学堂、自强学堂、湖北工艺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师范学堂等新式学堂。

1890年在武昌都司湖畔创办的两湖书院，实行分科教学，课程有经学、史学、舆地、时务四门，后仿照西式教法，增加天文、格致、兵操、化学、博物、经济等课程。

作者参观了这所著名的新式学堂，记述道：“两湖书院遴选的学生都是拥有秀才功名的青年，学成后将担任教习或派赴欧洲。书院由一名翰林院学士领导着，没有外国人任教。”

出于对张之洞实施的教育改革的好奇心，作者一行人走进了课堂，近距离观摩了各科教学活动，留下了这样的记载：“文科方面，学生要用中文来论述西洋主题。他们的论题似乎过于笼统，不够精专，显示出所教科目流于表面。比如教习见我在场，遂提出‘简述法国历史’的论题。与此不同的是，数学课显得充实一些。学生们认真地学习几何、代数、三角。他们知道使用对数表和解三角形，甚至是球面三角形。”“物理课和化学课则完全是经验论的作风。中国教育没有上过任何欧洲学者的课程。他是在家庭受教育的。他的父亲据说是一名有名的化学家。为了给参观者留下印象，他做了一些幼稚的试验，期望引起热烈的反响，比如说把石蕊试纸变红变蓝，再就是混合两种无色溶液形成有色沉淀。当他倒空了父亲留给他的科学行囊时，他的弟子们可能还有许多东西要学。”

在见识了新式学堂的课堂教学后，作者得出了中国的教育革新只有靠西方人的介入才能够成功的结论。他断言：“以中国的教育现状而言，不聘请欧洲教师来教授西洋文理，是绝对不合逻辑的。”

军事教育强兵经武

历次反侵略战争的失败，张之洞格外重视军事，提出“兵之于国家，犹气之于人身也”，认为只有强兵经武才能免除瓜分之祸。他在《劝学篇》中阐述了保国必先强兵

的思想：“我果有兵，弱国惧我，强国亲我，一动与欧则欧胜，与亚则亚胜。如是则耀之可也，弭之亦可也，权在我也。”其大意是：倘若我的军事果真强大了，强国就会亲近我，弱国就会惧怕我。我与西方列强联手，西方列强就胜券在握；我与亚洲诸国联手，亚洲诸国就胜券在握。



汉阳城郊和铁厂

作者注意到，彼时武汉的新式学堂极少有西洋人任教，即使是主授洋文的自强学堂，也仅有一名日本教习，而武备学堂却聘请了三名德国教官。“这个例外说明，张之洞以练兵为第一要务，为了达成所期望的成效，他打算做出任何必要的让步，即使是对于与西洋人的合作有着本能的反感。”

此外，张之洞的强兵思想还体现在把军事教育引入到非军事院校中。“在武昌所有的学堂中都能够发现总督对于军事十分上心。到处都在教导武器的操作。在师范学堂、自强学堂、农务学堂，每个学生都配发了步枪，并学习如何使用。似乎想要向湖广地区的知识精英们灌输军人职业的崇高和功用，这与中国的传统观念截然相反。”

官督商办僵化腐败

工商方面，张之洞虽有“劝工”“劝商”的倡议，但却认为须在官办和官督商办的规制下发展工商活动。正如他所言：“华商陋习，常有藉招股欺骗之事，若无官权为之惩罚，则公司资本无一存者矣。机器造货厂无

官权为之弹压，则一家获利，百家仿行，假冒牌名，工匠哄斗，谁为禁之？”而洋务运动的实践却证明，正是官权的强势干预，违反了企业运行的经济规律，导致企业后劲不足、发展困顿。而各级官员的贪污腐化，使原本就捉襟见肘的洋务经费雪上加霜，严重地阻碍了工业革新的步伐。

作者记述道：“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工厂的经营方式：日本煤炭运往汉口，每吨价格最近恢复到了8或10两银；中国煤炭产自宜昌以南的矿井中，同等条件下，每吨价格只需3到5两银。我访问工厂时，使用的是中国产的煤炭，但却声称购自日本，而且还会虚报重量。另外，有人告诉我，当煤炭入库时，武昌的大部分官员都会跑来运煤回去供自己使用。维持机器运转的燃料的价格，就是被这样一些行为大大提高的。”

在官办或官督商办的规制下，官僚们通常采用管理衙门的方法管理企业，企业内充斥着封建官场习气。以张之洞为例，曾参与创办铁厂的钟天纬称其“躬亲细务，忽而细心，锱铢必较；忽而大度，浪掷万金；忽而急如星火，立刻责成；忽而置若罔闻，延

搁数月。一切用人用款皆躬操其权，总办不能专主，委员更无丝毫之权。用款至百缗以上，即需请示而行，迨请示则又健忘多病，动延数月。”

落后的管理水平导致企业难以健康运行，逐步丧失盈利能力，出现了衰败的迹象。作者感叹道：“参观这些工厂就会察觉到监管完全缺失所带来的诸多影响，但没有什么比纱盆、锭子和织机闲置不用更令人痛心的了。随处可见蛛网、灰尘、铁锈和各种污垢，目前半数以上的设备处于这种状况。”“缫丝厂已停工很长时间，预计不会再复工了。在织布厂和纺纱厂里，只有半数织机和锭子在运转，制麻厂的情况则更糟糕。”

僵化的管理和低下的效率使企业的经营陷入了困境，给西方的经济侵略提供了可趁之机。“工厂面临困境。张之洞并非唯一受其折磨的人。因为还有一些热衷于投机的中国富人购买了工厂股票。他们想要摆脱困境。他们对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知道，在中方的管理下永远都不能盈利，因此敦促总督把工厂卖给外国人。”

对待西学功用主义

以历史的角度来看，张之洞在三镇开展的洋务运动，极大地改变了本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面貌，“中国的中心成为了帝国军事改革以及精神和物质进步的试验田”。但由于经费短缺的限制，更由于封建性和腐朽性始终贯穿于洋务运动之中，张之洞的近代化目标无法完全达成。

作者悲观指出：“如果张之洞能够征收湖广的所有税收并掌控其财政的实际用途，他将能够大干一场。但他既没有那么大的权力也不想开展如此激进的改革。因此，一切

都将保持现状。官吏将继续中饱私囊；由于缺乏经费和称职的校长，武昌的学堂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产生自大的无知者，仅满足于他们自认为深刻实则肤浅的教育；而管理不善的工厂则将走向灭亡。”

除了对教育、工业等领域的革新进行观察，作者还探讨了张之洞在推行洋务的过程中对于“西学”的复杂心理和矛盾态度。张之洞崇尚传统、维护纲常，始终对“西学”怀有戒心。

作者指出：“因为推动张之洞进行改良的不是对西方文明的欣赏。相反，他对西方文明表现出与中国所有学者一样的蔑视。他的真正目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基于此种认识，“张之洞决心在他所开展的复兴运动中把与西洋人的合作减少到最低限度”。在武昌的几家纺织厂，“对于维修精密复杂的机械，有时不得不求助于西洋人，但在平时，西洋人是被排斥在外的”。

作者认为，“除了武备学堂之外，张之洞的改良思想几乎被他摒弃西洋人相助的决定而彻底抹杀了”。这也反映了清末洋务派们“用夷防夷”的普遍心理。正是这种对待西学的功用主义态度，在这场自上而下的自强运动中，洋务派开办工厂，学习了西方的器物，却没有学到器物之灵魂；洋务派创设学校，学习了西方的科学，却没有学到科学之精神。

吴敏，汉口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汉阳藏书家叶名澧略述

◇ 王晓清

叶名澧(1811—1860)，汉口叶开泰药铺后人，也是清朝嘉庆、道光时期著名的藏书家。叶名澧之籍贯汉阳，系晚明至清汉口镇隶属汉阳县之故。叶氏藏书在中国藏书史上的地位，学者虽有论及，但大多语焉不详。因而笔者不揣简陋，搜求文献资料，将叶氏藏书之业略加梳理，以供研读武汉地方藏书史、学术文化史者之一助。

广交天下鸿儒

叶名澧，字润臣，一字翰源，别号端四生，叶开泰第七代掌门人。明朝崇祯十年（1637），徽州商人叶文机到“弹丸甲全楚”的汉口镇行医，在汉正街鲍家巷以创办叶开

泰药室而擅名一时。因为崇尚“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的诚信理念，生意十分兴隆。到叶文机孙子叶文良时，叶开泰药室改名为叶开泰药铺，开始臻于全盛时期，在楚地药行巍然独立，名震武汉三镇。

叶继雯（1755—1824），叶开泰第五代传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授中书舍人。叶继雯之子叶志诜（1776—1861），第六代传人，以贡生而为国子监典簿。叶志诜在朝廷官职不高，但长期与典籍、古本打交道，养成嗜古成癖的习性。

叶名澧为叶志诜次子，兄长系大名鼎鼎的叶名琛（1807—1859）。叶名琛为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咸丰二年（1852）简授两广总督，次年官拜体仁阁大学士，

此为叶开泰家族最为荣耀、鼎盛之时。

叶名澧久困场屋，道光丁酉年（1837）乡荐为中书舍人，历任内阁中书、同文馆、玉牒馆帮办，方略馆校对、文渊阁检阅、侍读，至浙江候补道员。他虽科场不甚得志，却精擅诗文，耽溺考据，酷嗜藏书，广交天下诗文名士。京师时期，他师从江苏山阳名士、诗学家潘德舆攻习诗文，出入老杜，清微道厚，为时人称誉。文坛知名之士如上元梅曾亮、道州何绍基、武进汪仲穆、广西王少鹤、闽县刘炯甫、桂林朱琦、瑞安孙琴西、镇海姚燮、监利王柏心皆与之迭相唱和。

叶名澧敦于故旧亲睦之谊，救人于风尘水火之中。乃父叶志诜进学之师翁方纲曾孙女流落贫民间，他知晓后养为己女而嫁入仕宦之家，以笃于孝义在京师传为美谈。京师湖广会馆供奉之江忠烈公忠源遗像自湖南新宁运抵京师，经由他之手送到会馆乡贤祠，并为之赠以诗词。明朝大文士李东阳在正德九年（1514）撰写的《慈恩寺诗》刻石立在湖广会馆，而《慈恩寺诗》真迹则为他所珍藏。因为对考据学家的尊崇，他和同仁曾祭祀明清之际的著名考据学家、金石学家顾炎武，也曾以诗纪念宋朝著名学者王应麟。

平安馆与敦夙好斋

叶氏藏书肇端于叶继雯平安馆，叶志诜继之将平安馆藏弃更臻富瞻，叶名澧则在



平安馆基础上更筑敦夙好斋藏书处，因而在京华厂肆荣膺盛名。叶家祖孙三代在京师仕宦，精擅鉴赏，又家富赀财，因而平安馆暨敦夙好斋成为京师收藏家品评书画、金石、古器物的赏鉴交游中心。

叶名澧继承父祖志业，在古籍善本的购藏上更臻新境，在版本目录学、考据学上更辟新径，其敦夙好斋所藏宋金元珍善本、明刻本、抄本、稿本、名家批校本，为同代学者所倾慕。叶名澧在《上巳日独游厂肆》诗中谓“我从束发始，载籍心所亲。持钱入书肆，把册忘昏晨。”因为出身书香世家，三代仕宦京师，自少在京师长大，对古籍善本的衷爱潜滋暗长，叶名澧成为京城厂肆的常客。咸丰辛亥人日（1851），他和同僚苏廷魁同游京师琉璃厂，在书肆见明末黄道周手书《孝经》，他断定为黄道周之蔡夫人代书，即以白金五十饼购藏。

叶名澧在版本目录学上，对前代学者的经典著作熟读精思。唐代陆龟蒙《丽泽丛

书》、宋代《类说》、元代陶宗仪《说郛》、明朝毛晋《津逮秘籍》、清朝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叶名澧对之历数家珍，十分精熟，认为“稽古者得以按册而购藏之”。宋朝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钱曾《读书敏求记》、钱坫《曝书杂记》、张月霄《爱日精庐藏书志》《钦定天禄琳琅前后编》等流略之学著作，是叶名澧经常校阅的图籍，以之比较版本优劣，以为购藏之参照。叶名澧和同辈的版本目录学家邵懿辰经常讨论版本校勘之事，邵懿辰著有《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对叶名澧从事古本搜求与考证助益良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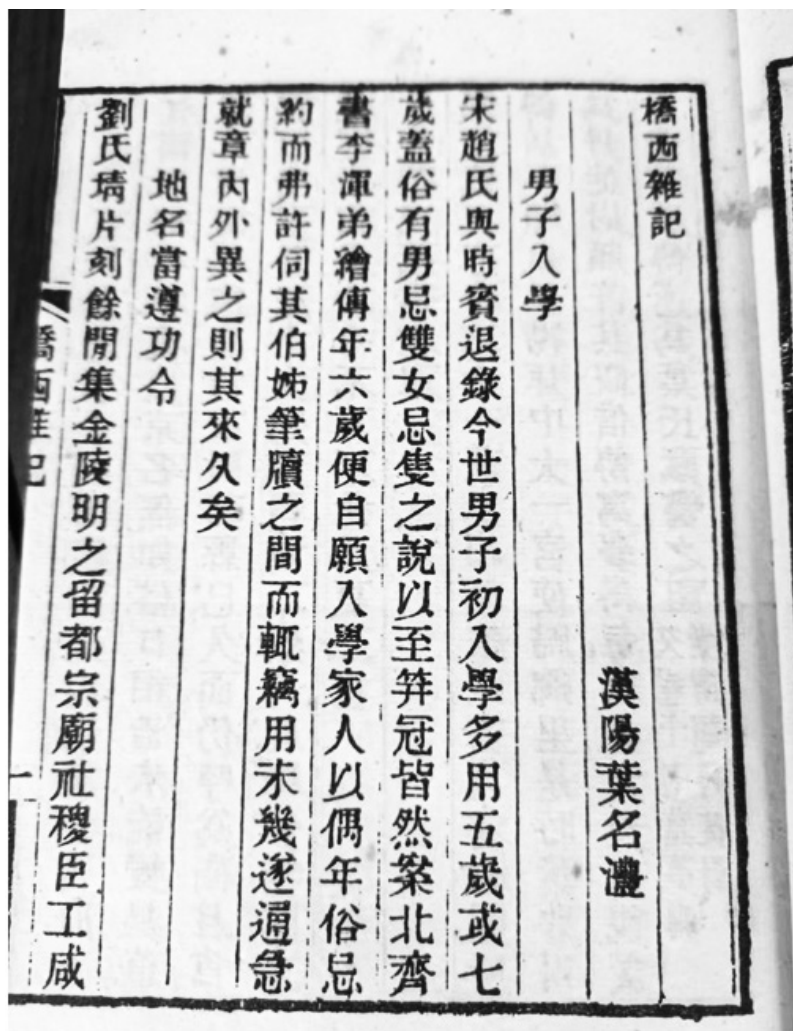
叶名澧庋藏稀见宋金元珍善本，不遗余力收藏不经见的抄本、稿本、名家批校本，

不是为了炫博矜奇，也不是为了夸富侈秘，而是为了作文献考据之用，以为经史问学之途。嘉道时期，汉学派旗帜甚张，众多学者以考证而名冠学坛。

叶名澧自然不能置身世外，他有意识地购藏阅读顾炎武《日知录》《金石文字记》、章学诚《文史通义》、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十驾斋养心录》、赵翼《陔余丛考》《廿二史杂记》、阎若璩《潜邱劄记》、汪中《述学》、张尔歧《蒿庵闲话》诸多著作，对金石学、史学、文献学、考证学皆入流而志在纂述。叶名澧考证唐朝注《荀子》之杨倞为唐穆宗时人、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王应凤为双胞胎兄弟，皆纠弹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十驾斋养心录》中的考证之失。

叶名澧对本朝历史掌故、官制、礼制、科举考试、语言文字、民间习俗备加留意，以仿顾炎武《日知录》样式撰著《桥西杂记》。因为注重满洲历史，叶名澧对辽金元三朝史论著刻意搜求，购藏有汪辉祖《元史本证》、施国祁《金源劄记》、周春《辽金元姓谱》等当代学人论著。

叶名澧敦于道义，对父执辈学者著作尽一己之能加以抄存，以广流传。安徽黟县人俞正燮，知名学者，屡试科举不中，在京师时为叶继雯聘为西席，教读其孙叶名琛、叶名澧。俞正燮著作很多，当《癸巳类稿》刻入杨氏连筠簃丛书时，叶名澧和兄叶名琛协助抄录、誉正、



校对。同时，叶名澧抄录了俞正燮未刻板的《癸巳存稿》《癸巳臆稿》。

常熟翁同龢后贵为帝师，但其年辈晚于叶名澧。叶名澧擅长诗文，曾搜集不少苏东坡诗集及注释，并在其《桥西杂记》写有“苏东坡诗补注”条目。酷爱古籍版本的翁同龢，曾在叶名澧敦凤好斋阅书，见宋朝施元之、顾禧传《注东坡先生诗》四十二卷，叹为瑰宝。吴县潘祖荫收藏商周彝器，滂喜斋藏书、刻书为后世所羨称，而叶名澧则为潘祖荫之前辈。潘祖荫之父潘绶章和叶名澧同官内阁中书，关系十分密切。潘祖荫伯父潘曾莹与叶名澧交游密迩，叶名澧藏珍稀抄本《兰雪集》二卷，潘曾莹为之题诗，还将自己的印章“星斋”钤盖在抄本上。因为父辈与叶名澧关系亲密，潘祖荫收书、购藏金石、青铜鼎彝大抵源自叶名澧的启迪、开导。

叶名澧著述宏富，著作有《读易丛记》二卷、《周易异文疏证》《礼记郑读疏证》《战国策地名考》《强识录》《徐寿辉韩林儿事辑残本》《桥西杂记》一卷、《孰素好斋诗初编》十二卷、《平安馆金石文字》。

叶氏珍藏今何在

叶继雯、叶志诜、叶名澧祖孙三代庋藏珍本图籍及金石鼎彝，藏弃十分丰富。薪水陈沆谓平安馆“八万卷过秀水朱”，此“八万卷”当是叶继雯时之庋藏。潘祖荫谓叶名澧敦凤好斋“拥书数万卷”，并在刊刻叶名澧



《桥西杂记》时谓，“不及十年藏书散尽，遗著沦诸废纸，已刻诗编亦不知归何所。”

那么，叶氏平安馆、敦凤好斋珍藏，究竟是什么原因不及十年而风流云散呢？按照孙殿起《琉璃厂小志》记载：山西文人李炳勋在北平江西会馆开设宝名斋，在同治年间收购叶志诜家藏书籍，总计一百箱。叶家为什么要着急处理京师庋藏图书呢？应与叶名琛、叶名澧、叶志诜先后病逝大有关系。叶名澧以浙江候补道员突然在杭州病逝，随身携带的少数珍藏，可能被后人就地出卖。因而在同治、光绪乃至民国时期，杭州旧书肆还有叶志诜、叶名澧钤章的珍本古籍零星交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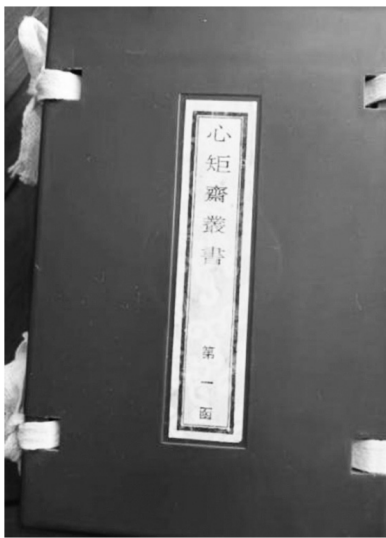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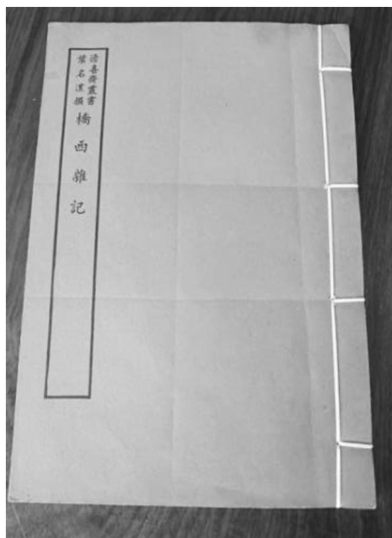
作为嘉道时期有影响、有地位的叶氏藏书，虽然不出三代即杳歇，但在武汉地域

藏书史、中国私家藏书文化中自有其地位，这是显而易见的。因而有必要将叶志诜平安馆、叶名澧敦夙好斋留存于后世的庋藏加以梳理，以窥之一斑。

在晚清、民国乃至现代著名藏书家所撰藏书目录、题跋著作中，有不少记载了叶氏的庋藏，其中珍本古籍或珍稀抄本上，钤盖有“志诜之印”“东卿过眼”“平安馆印”“宝芸斋”“叶名澧”“润臣借读”“汉阳叶名澧润臣甫印”“叶氏敦夙好斋藏书”“汉阳叶氏敦夙好斋印”“叶名澧润臣印”诸印章。由此钤盖印章，可以清晰明了叶氏经藏古籍及珍本当今的流向或存佚。缪荃孙《艺风藏书记》《艺风藏书续记》、叶德辉《郎园读书志》、邓邦述《群碧楼书目》、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李盛铎《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叶揆初《卷盒书跋》、潘景郑《著砚楼书跋》、周叔弢《弢翁古书经眼录标注》、黄裳《前尘梦影新录》诸书中，皆散见有叶志诜、叶名澧经藏或题写跋语、签题且钤盖印章的珍稀善本，虽一鳞半爪，但皆吉光片羽，十分宝贵。

现代著名藏书家黄裳谓：“名澧所藏多清刻名集，明以前刻则未见，其人盖深于书而能读书者。”这一判断对了一半，即“深于书而能读书”，但“明以前刻则未见”则可能与黄裳自己的购藏或闻见有关系。

叶名澧所庋藏者，有清刻本，还有宋刊本，金、元刻本，明刊本，更多见的则是珍稀抄本、影宋抄本和名家批校本。《注东坡先生诗》四十二卷，宋施元之、顾禧传，宋刊本，半页九行十六字，注双行同，白口，



左右双阑，系叶名澧过藏本。散出后为常熟藏书家翁同龢所有、吴县藏书家潘祖荫题跋、江阴藏书家缪荃孙谓为“海内孤本”。

和叶名澧有通家之好的潘祖荫，藏有不少叶氏珍本。《新雕云斋广录》，宋人李献民著，珍稀金刊本，板匡高 16.1 公分，宽 11.5 公分，为明末清初泰兴藏书家季沧苇所藏，后流徙为叶名澧藏。《新雕云斋广录》钤盖两枚叶氏印章，一为“叶名澧”朱白文方印，一为“汉阳叶名澧润臣甫印”。流散后，为其弟子潘祖荫所藏，钤有“潘祖荫藏书记”朱文长方印。《新雕云斋广录》现藏台湾台北图书馆。《则堂先生文集》六卷，宋家铉翁撰，缺卷五、六。旧写本，九行二十五字，钤有叶名澧藏书印，为潘祖荫所藏。潘祖荫侄孙、知名藏书家潘景郑，也购藏了不少叶志诜、叶名澧父子的珍藏，如：叶志诜所藏卢见曾雅雨堂刊本《金石录》，系过录翁方纲硃墨批校本，叶名澧珍藏钞本《康成遗书》四种，经钱大昕朱笔点读、校勘。叶名澧自谓藏弃一册钱曾《读书敏求记》，该本为黄丕烈批校本。

晚清民初著名藏书家缪荃孙艺风堂，藏存了叶氏流散出的珍藏六种，即叶志诜手

稿本《平安馆碑目》八册、《高丽碑全文》四册、叶志诜手抄本《刘燕庭所得金石目》一卷、叶名澧藏旧抄本《癸巳臚稿》一卷。商务印书馆1957年重版《癸巳类稿》时，曾参考了《癸巳臚稿》。叶名澧旧抄本经缪氏艺风堂而现归藏上海图书馆。叶名澧所藏明嘉靖甲申宗文堂郑氏刊本《新刻蔡中郎伯喈文集》十卷、旧抄本《傅与砺文集》十一卷附录一卷，亦为缪氏艺风堂所续藏。叶志诜手稿本《平安馆碑目》《高丽碑全文》《刘燕庭所得金石目》则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江西德化著名藏书家李盛铎木犀轩庋藏叶氏旧藏四种，即叶志诜旧抄本唐瞿昙悉等撰《大唐开元占经》，存卷一至一七；叶名澧藏校宋本、唐释玄应撰《一切经音义》；旧抄本《清波杂志》十二卷，系朱筠、王士禛、查慎行批校本；抄本宋李耆卿撰《文章精义》一卷。李盛铎藏书后全部卖给北京大学，叶氏四种藏入北大图书馆。

长沙著名藏书家叶德辉观古堂，藏存叶氏《三国史辨误一卷》，此初为仁和藏书家朱学勤结一庐所藏，结一庐书流散后为湖南永明雕刻家周星诒所得，观古堂即从周星诒购藏。叶德辉还藏存叶名澧抄本凌廷堪撰《元遗山年谱》二卷。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双鉴楼庋藏叶名澧藏元刻本、宋苏轼撰《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二十五卷和宋傅藻撰《东坡纪年录》一卷。江宁著名藏书家邓邦述群碧楼购藏叶名澧藏宋刻本《咸淳临安志》一百卷、五十册，抄本宋陈淳《北溪先生文集》五十卷《外集》一卷，十六册。群碧楼藏书后转卖给民国中央研究院，叶名澧过藏之《咸淳临安志》《北溪先生文集》现藏台北图书馆。知名藏书家叶揆初藏存叶志诜旧藏陈伯恭、翁覃溪两家批《曝书亭集》，今存上海图书馆。

现代著名古籍文物收藏家周叔弢藏存有叶氏珍本，即叶名澧过藏旧抄本张若琼《兰雪集》二卷，有陈文述题诗题跋、潘曾莹题诗，钤盖“汉阳叶名澧润臣甫印”。《兰雪集》今藏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收录（08551）。周叔弢藏叶志诜平安馆藏影宋抄本《汉书》，存帝纪十二卷、志八卷、十册，钤盖有“叶志诜印”“东卿过眼”两方印章，今藏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收录（18135）。

黄裳也藏存三种叶氏珍本。一是叶志诜藏嘉庆刻本、博明著《西斋偶得》《凤城琐录》《西斋诗辑遗》三卷。该书前此为翁方纲所藏，后为叶志诜继藏并题写跋语，钤有“平安馆印”，黄裳购自杭州清河坊拜经楼旧书肆。二是叶名澧藏乾隆刻本、张绣虎撰《白云集》。三是叶名澧藏嘉庆刻本《春融堂集》《杂记》八卷，钤盖有叶润臣印章，先后由拜经楼吴騫、陈鱣递藏，黄裳从沪上书贾徐绍樵店肆购藏。黄裳在《白云集》题跋中谓叶名澧重清刻本，颇有好评。

叶氏平安馆、敦夙好斋祖孙三代珍藏，不旋踵即风流云散，且有些珍本荡为煨烬，但叶氏遗芬散馥如零金碎玉，流传至今约250年仍在公私藏家之手，已成为中华藏书文化之瑰宝。

王晓清，武汉电视台高级记者

汉口西门子洋行、美最时洋行旧址探讨

◇ 韩少斌

在汉口历史风貌区，有二幢历史建筑列入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分别是“西门子洋行旧址”（中山大道1004号）和“美最时洋行旧址”（一元路2号）。然而，这两处历史建筑的命名，能否准确反映它们的历史意义与变迁，也许是存在一些疑问而值得商榷的。

中山大道1004号一直名为电报局大楼

中山大道1004号建筑属现代风格，外墙为灰色砂砖砌筑，主入口在中山大道与天津路转角上。《汉口租界志》记载，“汉口电报局，1920年在英租界湖北街（今中山大道）与天津街（今天津路）的转角处（今中



今中山大道1004号建筑

山大道1004号），紧挨电话局处建成四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大楼”。

1884年，上海至汉口电报线路工程竣工，汉口始设电报局于老熊家巷河边招商局

内，为武汉电信事业之肇始。1913年，北洋政府交通部在全国设电政管理局，鄂湘区电政管理局监督兼理汉口电报局总办，迁汉口电报局于英租界凤池里。1920年，天津街新楼完工后，再迁于此处。1927年，该局由交通部定为全国4所特等电报局之一，直属部辖。1929年，湖北电政管理局由武昌迁至汉口后，该局级别降低，改属湖北电政管理局管辖。1934年始兼营长途电话业务。同年，全国通商大埠实行邮、电合并，汉口无线总台并入该局。1937年，该局并入湖北电政管理局，兼理汉口电报和长途电话业务。1938年10月西迁。

武汉沦陷时期，日本人垄断了汉口电信电报业务，分别在江汉路和湖北街（今中山大道）设立“特别军用汉口电报局”和“特别军用武汉电话总局”。抗战胜利后两局撤销，未成立新的电报局，其业务并入1946年成立的武汉电信局。

据《武汉电信志》记载，电报局大楼与相邻建于1915年的电话局大楼，1944年12月遭遇美军飞机轰炸。1945年10月，武汉电信接收委员会办公处约请9家公司招标，汉口永年建筑公司中标修复两大楼并建联通大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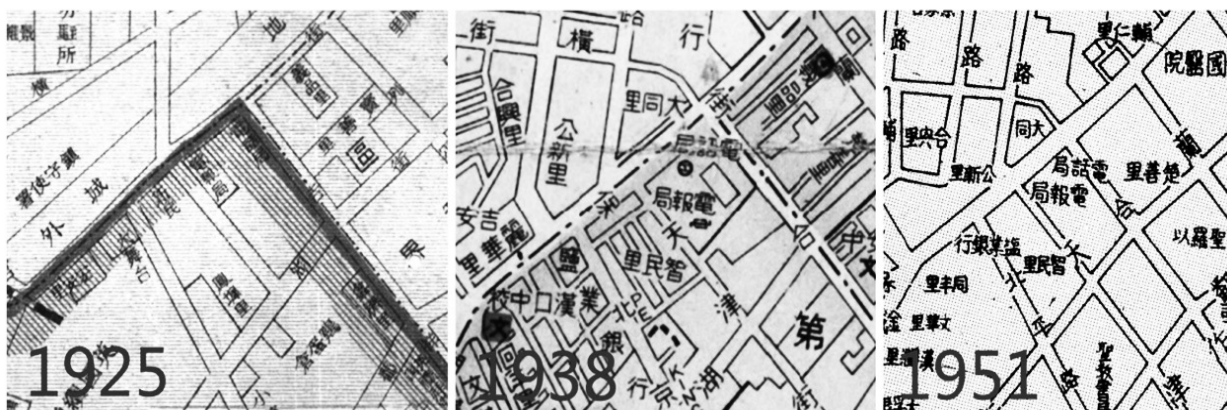
抗战胜利后修复并建联通大楼

综上所述，今中山大道1004号建筑从建成始主要由电报、电信部门使用，从1926年到1951年多张地图标注均如此，建筑称呼也未改变，使用汉口西门子洋行旧址名称，有“鸠占鹊巢”之嫌。

一元路2号使用者并不单一

一元路2号建筑地上三层，底部有半地下室，楼体庄重典雅，古典主义建筑风格。

此楼业主说法不一。1909年《汉口全图》



汉口老地图上标注均为电报局



今一元路2号建筑

稍右标为波弥文栈房，1917年《汉口特别区图》为德商德达生洋行，20年代《汉口市街新图》又索引为英商瑞昌洋行和西门子电器，《汉口租界志》则介绍为捷臣洋行。抗战胜利后，曾为武汉军警宪联合督察处、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等所在地。解放后为武汉市卫生局驻地。均未提及德商美最时洋行。

德商美最时洋行，1806年成立于德国不来梅市，总行设在柏林，是德商中较早和较大的洋行之一。1909年《汉口全图》中显示，洋行设在英租界华昌街（今青岛路）口。后迁到德租界，主要在二曜路江边，《汉口租界志》“清末民初在汉洋行（114家）一览表”“辛亥革命前在汉洋行名录”“抗日战争武汉沦陷时期汉口洋行一览表”，均介绍为“沿江大道二曜路口”或“特一区外滩”。

《武汉文史资料文库》第五卷载有《汉口美最时洋行》

一文，作者金宝善在美最时洋行任职达37年，他介绍美最时洋行汉口分行设于1862年，以经营出口为主、进口为辅，并经营保险和轮船等业务，另设有电灯厂、蛋厂、牛皮厂等。行址初设英租界，后迁德租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最时汉口分行的德国人均撤离回国，财产托荷兰总领事馆代管，行址由北洋政府作为京汉铁路局办公之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商人参与投资，改名为美最

时中国合作公司。20年代初美国资本退出，恢复汉口美最时洋行牌名，抗日战争时期停业，仅留少数人看管财产。武汉沦陷后，美最时汉口蛋厂等被日军占用。1944年，美最时蛋厂、电灯厂以及栈房（除牛皮厂外）和华籍职工住宅等被美机炸毁。抗日战争胜利后，美最时大班何伯乐、阿尔的美登及门达等3人被遣送回国。



二曜路江边美最时电厂公事楼（右侧）

金宝善所说上述内容，未提到行址的准确位置和具体变迁，但就其描述其在汉经营时间及其规模，似与一元路2号建筑契合不足。

西门子房子与“鲍公馆”

中山大道1004号和一元路2号两处历史建筑，都提到了西门子公司。《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第七辑钱心如《管趾卿与科发药房及西门子洋行》一文说：“西门子洋行是德国西门子电机厂在中国的独家发行所，专营西门子产品。汉口西门子的招牌就称德国西门子电机厂。”

西门子公司创建于1847年，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电气公司之一。1901年，西门子洋行在汉口租界内开办市内电话，租界的电话一度被其垄断。1915年，交通部出资9万元将租界电话收归国有，由武汉电话局管理。1938年9月，日军逼近武汉，武汉电话局将4000台自动电话交与西门子洋行保管，不久被日本人连同大楼一并占去。西门子洋行作为战败国的一个商业机构，于二战结束时撤离中国。

在《汉口租界志》“清末民初在汉洋行(114家)一览表”中，西门子电气公司在旧英租界，西门子洋行在上海路天主堂对面；“辛亥革命前在汉洋行名录”中，西门子洋行仍在上海路。“1924年部分在汉洋行名录一览表”中，西门子(德)就改到了特别区(原德租界)。西门子在汉口报刊上曾刊发大量广告，经营自产电力机、电报电话机、各种电料灯泡

等，办事处地址就在特别区一元路。结合上文《汉口市街新图》索引，可与一元路2号建筑联系起来。

就笔者所能接触的少量汉口旧报纸中，《汉口新闻报》1921年6月21日有一则广告，称华发公司经理西门子水汽，地址清楚定在特别区(原德租界)捷成洋行旧址(与《汉口租界志》记载吻合)，经理朱芑臣。不久8月12日广告，以汉口西门子电灯泡价廉物美代替了公司，但仍以华发公司经理朱芑臣启落款。1922年8月的广告，就直接称汉口西门子。这很可能是一战后，德商假借名义复业的变通之法。因为这位朱芑臣就是上海西门子总行买办、董事管趾卿的好友，负责西门子黄河以南、华中一带业务的汉口西门子洋行买办。管、朱与北京买办鲍星槎堪称莫逆，三人分掌着西门子洋行的在华业务。1927年12月到1933年报纸广告，西门子洋行地址均为法租界福煦将军街(今蔡锷路)7号。而1937年12月1日广告，西门子地址变为威尔逊路(今车站路东段)



《汉口新闻报》上的西门子广告

美国领事馆隔壁。

1918年到武汉生活了27年的日本人内田佐和吉，在《武汉巷史》中有专门一节提到西门子大楼与四三事件，称位于汉中街（今胜利街）角上的大厦就是西门子公司，德国领事馆在这条街上建馆的同时，西门子也在这条街上建楼。1926年底到1927年夏，鲍罗廷顾问在此主持事务。

虽然从上文可知，西门子是否是这栋大楼的原始业主存在疑义，但它确实在此经营，鲍罗廷也在此居住，这又与大革命时期在汉的郑超麟的回忆相吻合，他说“我常去六十一号（指今胜利街中共中央旧址），在那里揩油吃饭，在那里同好久不见的老朋友谈天，有时旁听中央重要会议，也常办些小差使。一次，奉了命令到离此不远的西门子房子去交涉一件什么事情。那是鲍罗廷公馆。”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著《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中说：“从外交部（江汉关监督大楼）穿过街道有一幢石块砌成的大楼，其下层为《国民论坛》社占用；上层则是米哈依尔·鲍罗廷的一套房间，他作为俄国顾问在国民政府任职，已为时四年。两位年轻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威廉和雷纳·普罗梅，经办《国民论坛》和《国民新闻》社，他们的任务是代表国民党人用英语进行宣传。”

斯特朗所述也与实际方位相符。1926年12月，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曾在此办公，召开会议、会见国共两党要员，大革命时期武汉许多政治决策出自于斯。鲍罗廷是斯大林派给孙中山的政治顾问，鲍罗廷在华工作4年期间，从国共合作关系的确立，到轰轰



鲍罗廷在演讲中

烈烈的北伐，每一次成功都有他的功劳。但他始终将全部对华工作的重心放在国民党方面，将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从属地位，对大革命的失败负有一定责任。

综上所述，中山大道1004号一直是电报、电信相关部门使用，西门子洋行全部或部分使用依据并不充分，且电报局大楼为其原始命名并一直延续，是近代武汉城市发展的标志之一。一元路2号虽使用者较多，一时难以厘清，美最时洋行在此活动的证据也不清晰，反而西门子洋行曾使用6年，特别是鲍罗廷大革命时期曾居住于此，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见证，有着特殊的意义。

近年来，武汉近代建筑越来越得到重视，已成为广大游客打卡之地，对其命名应更为慎重准确为宜。

韩少斌，武汉奥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总经理

藏身高校的“小省博”

——湖北大学博物馆

◇ 李本义 贺兴义 蔡莹 李牧宸



湖北大学博物馆

2006年5月，湖北大学博物馆在原陈列馆的基础上成立，享有“高校小省博”的民间称誉，同时是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和湖北省科普教育基地。

悠久文明的丰富展现

湖北大学博物馆藏品丰富，种类繁多，文物精品美不胜收。

若想领略翰墨风采，在名人书画展区，林则徐、翁同龢、任伯年、张大千……他们的字画，或规整洒脱，或浑厚雄长，或天然生趣，或明艳富丽，展现着文人学士的儒雅风流。

若想了解古代钱币文化，在钱币展区，不同质地的钱币琳琅满目，从早期的蚌贝到布币、刀币、圜钱、蚁鼻钱，从方孔“半两”钱、五铢钱到交子纸币、白银通宝，从铜币、银币到法币、苏区银票、金圆券……构成中国货币简明发展史。

若想观赏历代工艺美术魅力，在文物展区，品质精良、制作精细的玉如意、玉磬、玉印、玉盖、玉环，古朴端庄的青铜鼎、簋、爵、戈、剑，形态毕具、光泽如润的青釉十二生肖马首、景泰蓝香薰，古朴精当的石质器物，富丽光艳的漆木制品，绮丽精致的官服绣补等，无不气韵生辉，凝聚着工匠智慧，折射着历史沧桑。

若想观察缤纷的昆虫世界，在蝴蝶标本展区，近两百种珍稀多彩蝴蝶翩翩起舞，既有珍稀的“国蝶”宽尾凤蝶、西双版纳的云南丽蛱蝶、天山雪线附近的红星绢蝶，还有我国至今发现的唯一一只奇妙无比的凤蝶科阴阳蝶，以及南美洲亚马逊的金光灿烂大闪蝶。此外，世界最重的金龟子、最大的吉丁甲、巨蚊及螽斯，也在此一展其妙。

若想认识自然化石的神奇，在化石木展区，我国首次发现的武汉樟型木、武汉猫尾木等被子植物化石木，形态逼真，色泽鲜明，纹理清晰，让人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若想体验国学的古典魅力，在古籍珍藏室，可以近距离接触明清古籍善本 300 余种；在冯氏捐藏室，可以观赏文史大家冯永轩、冯天瑜父子捐赠的文物、文献，感受湖大先贤的人文情怀和治学精神。

湖北大学博物馆馆藏 1.3 万余件（套）藏品，涵盖青铜器、玉器、陶瓷器、书画、印章、钱币、石器、织物、漆木器、化石、生物标本等诸多门类，展现着悠久的文明史。

被子植物化石木标本

1984 年，湖北大学地理系齐国凡、徐瑞瑚等老师，在武汉阳逻砾石层中调查发现了被子植物化石木，被认为是“中国被子植物化石木群的重大发现”。

化石木是远古树木的茎、根、枝等植物遗存，骤看为木，细观为石。被子植物，俗名绿色开花植物，自新生代以来遍布地球蔓延生长。

中国是历史上发现和认识化石木最早的国家之一。唐朝文学家陆龟蒙、宋朝学者沈括、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等，都曾在著作

或诗文中作过描述。很长时期以来，我国调查发现的古生代和中生代的化石木，均以裸子植物为主，新生代也多为裸子植物。

化石木形成的条件很苛刻，需要特殊的地质条件和地理环境。据科学研究，阳逻曾是一个很深的大河湾，周围高山树木繁茂，气候炎热，雨量充沛。因频繁的暴雨引发洪水和泥石流，裹挟着泥沙、砾石和树木，迅速汇聚堆积在河湾里。被水体覆盖的树木夹在砂砾石层内，经过长期地质作用，形成了化石木。

因此，在大别山南麓阳逻发现的被子植物化石木群，被国际著名古植物学家、中国科学院徐仁院士等专家，认定为“我国首次发现”。德国波恩大学著名古植物学家斯威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库柏教授等参观时赞叹不已，认为这一发现是对国际古植物研究的巨大贡献。

明代镂空龙纹器盖

明代是玉器雕琢工艺的辉煌时期，镂空技术发达，透过深层次立体雕刻能兼顾里、外多层纹饰，形成重叠错落的造型之美，且分层镂空，能在片状器物上雕刻出上下不



同的双层图案，呈现出“花上压花”的装饰美感。

此件玉器是国家一级文物，直径 17 厘米，重 500 克，镂空技艺成熟，刀法刚劲有力，线条棱角分明，做工精细，佳材精雕与良工美玉相得益彰，呈现出明代玉雕精致典雅的艺术风格。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和意义，以龙为原型的工艺制品历代不绝。此件玉器盖面所镂龙形雄浑大气，富有张力。正中龙头突额怒目气势威严，龙须细细飘拂，龙身盘旋一周，龙尾摆在左上侧，其旁四条小龙环绕动感十足。四围夹有缠枝莲花，花瓣光洁圆润。古人常以同音字寓义，“青莲”同谐音“清廉”，其内涵为“苍龙教子，为官清廉”。工匠赋予它生命，文人赋予它精神。可见，清正廉洁从古至今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元代押印

元代官印统一由礼部印局制造，质地、形态均有严格制度，诸王印金质，正一品至正三品银质，从三品以下铜质。一、二品官印印背有台。此印为从三品中大夫印，铜质，无台，重 0.1 千克，长方形状，长 4.4 厘米，宽 2.2 厘米，高 3.3 厘米，形式庄重，方形鼻钮型，篆文，一面印，印文为“中大夫”（官名）。为国家三级文物。

元代官印皆为朱文，边框渐宽，这对后世官印影响较大。元代作为少数民族执政的朝代，崇尚汉制，也提倡儒学文化，秉持“以汉制汉”的统治思想，受汉族文化影响之深亦可在押印中体现。

押印最早出现于五代时期，流行于元代。元末明初文学家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

卷二中记载：“（后）周广顺二年，平章李穀以病臂辞位，诏令刻名印用。据此，则押字用印之始也。”

押印在元代的广泛流通，与元代的历史背景、多民族文化交融是分不开的。文字改革适应实用需要，楷书押印的出现，摒

弃了唐楷正规的书写方法和九曲盘旋的篆文。又因押印大量在民间流行，充分体现出无拘无束的民间书风，一改前朝规矩的模式，在文字上更多吸取了魏碑率真自然、极富个性的艺术韵味，章法上留出大片空白，这就使印面文字十分醒目活泼。

此件押印印文“中大夫”以隶书雕刻，线条舒缓流畅，端庄大气，其审美情趣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种风尚时尚，为研究中国印学史、文化史提供了很好的实物参考资料。



鄂东南工农银行纸币

1929 年至 1930 年，李灿、何长工、彭德怀等率红五军先后进驻湖北阳新县龙港镇，建立了鄂东南苏维埃政府，并设立军校、医院、工厂、银行等多个机关单位，成为鄂



东南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誉为“小莫斯科”。

此币背面印有“革命宣传口号”：“劳苦群众们，工农银行是为工农谋利益而设立的，发行票币是防止现金流出，活泼苏区的金融，发展苏区生产事业，冲破敌人经济封锁的好办法。我们工农即是银行主人，应该拥护自己的银行，假若不信用银行票币，便是帮助了敌人的封锁，危害自己的利益。鄂东南工农银行五月七日。”

鄂东南革命根据地是“工农武装割据”的产物，经常处在国民党反动派分割包围的艰苦环境之中。因此货币只能在各自一小块战略区域内自成体系，从而形成明显的区域性。根据地银行基本上随军行动，人们常常称之为“扁担银行”。

《增修诗话总龟四十八卷后集五十卷》

《增修诗话总龟四十八卷后集五十卷》（以下简称《诗话总龟》）一书，为北宋诗词名家阮阅所辑，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月窗道人刻本。该书版式开阔、字体稠密、整肃古朴，是该版现今保存下来的唯一一种，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编号 06503）。

《诗话总龟》的出现，直接影响了后世诗话集的编缀，对后世诗话集及诗话丛书的编写有较大影响。阮氏因诗而一头扎进浩繁的笔记小说中，广搜博览，逢诗辄录，试图在故纸堆中打捞散落在各处的诗歌碎片，汇集众家诗话之大成。他“类而从之，以便观阅”，开一代风气之先，创作出诗话总集这一独特文学新形式，也缔结了诗话佳制与故事之间的姻缘。

《诗话总龟》语言风格自由灵活，漫



谈式的诗歌评论和叙事方式，使诗话极具可读性、学术性和文学性。翻开这部 400 多年前的古籍，我们可以领略构筑于文辞中的诗歌家园，品味诗学审美韵味。

湖北大学博物馆丰富而精粹的藏品，归功于一代又一代湖大人的广泛搜集、慷慨捐赠和精心收藏。博物馆以藏品为推手，围绕文物美学、国学典籍、自然科学等主题，开设多个文化空间。其中，国学文化教研以馆藏明清古善本为引，配合藏品文物，讲学深入浅出，引领学生与公众感受古典文化传承的历史信息，体验古代文化蕴含的审美情趣。

李本义，湖北大学图书馆党委书记、副教授；贺兴义，湖北大学档案馆副研究馆员；蔡莹，湖北大学档案馆副研究馆员；李牧宸，湖北大学图书馆馆员